

國立台灣大學生農學院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Bio-industry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ollege of Bioresources and Agri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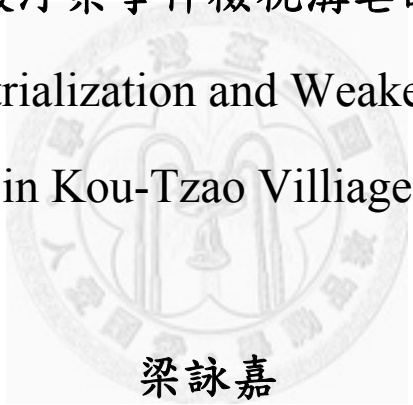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由皮革工廠汙染事件檢視溝皂的規範變遷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Weakening Norms

in Kou-Tzao Villiage



梁詠嘉

Liang, Yung-Chia

指導教授：陳玉華博士

Advisor : Yu-Hua Chen, Ph.D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July, 2010

謝誌

我們在天上的父：

滿心感謝祢，使我得到如此之多。

這篇論文能夠完成，實在是因為很多人對我的提攜與愛護，必須感謝指導教授陳玉華老師，雖然我研究法的訓練不夠扎實而鬧了不少笑話，但是老師始終苦口婆心地一再提醒，使我少走很多冤枉路，若不是老師如此用心，我想我可能還陷在一團混亂當中而無法整理與呈現自己的想法。林崇熙老師每次都細心準備，不藏私地提供我很多寶貴的意見，讓我稍稍跳出自己的框框，看到自己的侷限與可能性，對我有很大的幫助。蔡培慧老師參與社會運動時充滿熱情，但作為學術工作者又能夠秉持冷靜嚴謹的邏輯進行研究，深深令我感到佩服，使我看到了私淑嚮往的前輩典範。

若沒有溝皂自救會各位夥伴的堅持與協助，本論文勢必無疾而終，而我也無法認真反省思考我這一年所看到的到底是甚麼，雖然不完美但是卻是我們探索未來的開始，希望未來還能有機會共同創造回憶。

就讀台大的八年，各位師長、學長姐與同儕們都是我生活的支持力量，雖然我們都過著各自的生活，但是這些日子的相遇是最單純美好的回憶，尤其依軒的打氣常使我找回重新出發的勇氣，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就不一一列表了，希望你們都能感受到我默默的感激，日後我也希望能成為你們背後的一份力量。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父母，他們的支持使我無後顧之憂，我雖然是個任性、孤僻的孩子，但我所享有的往往是超乎我所盼求的，若有一天，我能夠開始給予、成為別人的幫助，這將是這個家教我最重要的事，也是令我感到最幸福的事，希望這個階段暫時告一段落是邁向這個美好夢想的第一步。

願大家都能平安、活在愛中，奉靠主耶穌的名祈求。

阿們

中文摘要

本論文以規範變遷的角度去探討鄉村社區的治理與永續發展，主要的討論集中社區規範如何在空間利用與產業發展上(不)發揮作用，並透過分析觀察以及訪談得來的資料釐清規範變遷的背景、情形與影響。

戰後以來，溝皂的經濟型態越來越走向理性化，經濟決策越來越被視為個體的行為選擇，而社區的框架在交通與通訊的發展的情況下漸漸模糊，內部成員的歧異與不均質也使得規範內容缺乏共識，而缺乏有效的社區規範將使社區意識與社會資本難以累積。

簡單來說，溝皂有關空間與產業的規範在形式與內容上有三項主要的變遷：一、規範的原則從在地的風俗習慣走向資源管理與現代生產的邏輯；二、國家角色與正式法令的重要性提升；三、規範的形塑方式從「生活習得」變成需要有意識地用大量溝通成本才能建構。筆者於 2009 年 7 月開始進入田野地---溝皂，當時溝皂正在發生皮革工廠汙染事件，事件的處理過程諸如里民大會、公部門與各種非正式的互相影響都不十分順利，溝皂社區環境自救會的出現與失敗更徹底顯示出既有社區規範的不足與重新建構的可能性。

最後，在本論文的結論部分指出鄉村社區必須發展其治理能力，產業利益與成員福祉能被全面地評估討論並形成運作的規範原則，才可能持續累積成員的社區意識與社區整體的社會資本，有助於鄉村社區的永續發展。

Abstract

It attempts to explore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to discuss how these norms could get effective in the space utiliz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o clarify the norm changes background and influence b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After the World War II, economic strategies of Kou-Tzao village are getting rational and considered as personal choices so that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becomes foggy. This situation is getting rise to diversity of inner members and besides hard to accumulat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short, the norm changes about space and industries of Kou-Tzao village are as following: First of all, the principles of norm transferred local customs to modernity; second, it enhances the importance of country and formal laws; third, the shape of norms is constructed by consciousness with huge communication cost rather than conventional way.

The researcher investigated Kou-Tzao village in July 2009 when the leather factory pollutions was occurring. In the same time, the environmental self-help association of Kou-Tzao, from arising to weakness, was thoroughly demonstrated the lack of community norm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re-construction.

It concludes that rural communities have to develop their governance capacity to pursuing both industry interests and well-being of inner members, and to form normative principles thus it is possible to accumul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目 錄

謝誌.....	I
中文摘要.....	II
英文摘要.....	III
目錄.....	IV
第壹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	1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3
第三節 論文章節安排.....	4
第貳章 文獻探討.....	5
第一節 鄉村的社會變遷.....	5
第二節 鄉村社區的規範.....	9
第三節 社區意識與社會資本.....	15
第四節 小結.....	22
第參章 研究設計.....	23
第一節 社區個案研究.....	23
第二節 田野地點說明.....	25
第三節 研究流程.....	29
第四節 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30

第肆章 戰後溝皂的變遷.....	34
第一節 產業的變遷.....	34
第二節 交通、資訊與價值觀的變遷.....	41
第三節 社區結構的變遷.....	45
第伍章 溝皂規範變遷之探討.....	53
第一節 結構變遷的背景.....	53
第二節 規範變遷的情形.....	60
第陸章 過程-事件分析：皮革工廠汙染事件.....	63
第一節 個體行為？設廠與經營.....	64
第二節 逐漸浮現的外部性.....	67
第三節 缺乏社區架構的行動：抱怨、自救會與公部門.....	71
第四節 事件過程中的關係變化.....	83
第五節 小結.....	87
第柒章 結論.....	88
第一節 結果與討論.....	88
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90
參考文獻.....	91
附錄.....	101

附錄一	訪問大綱.....	101
附錄二	訪談對象列表.....	102
附錄三	溝皂歷史年表.....	103



由皮革工廠汙染事件檢視溝皂的規範變遷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在現代化的社會變遷過程中，台灣鄉村的關係、空間與經濟特性不斷地在改變，處於變遷脈絡的「鄉村社區」必然得重新思考其指涉的內涵為何，在關係方面，交通與通訊的發展，社區的關係網絡不再侷限於聚落裡面，透過遷徙行為或各種社會關係的建立拓展到許多不同的地方，反而鄰里關係的強度有可能逐漸在減弱；空間的使用上，除了原有的家戶居住、農業生產與集體生活之外，也出現了非農產業、聯外道路與各種正式機構；經濟生活的各層面(生產、就業與消費等)也都跨出原有聚落的範圍，這些改變都使得社區不能再只以原有聚落範圍作為疆界，而必須納入延伸出去的社會網絡與系統，但是為了避免過度擴大而無效的社區定義，本研究透過社區規範的運作情形來探討個體成員對社區意識的認同以及集體運用社會資本所進行的社區治理。

1960 年代以來，政府積極推動的鄉村工業化政策，本來希望藉由增加的就業機會來均衡區域發展與抑制人口外流，但受限於鄉村工廠本身的產業特性與勞動條件，政策達成的成效十分有限(陳國川 1982)，反而帶來了非預期的環境汙染問題。但是也正是因為汙染問題的發生，反而使吾人得以有機會重新現代鄉村社區的規範與治理框架，指出現有機制的侷限並提出變革的可能性。

溝皂位於北港鎮郊，1960 年代後開始有居民返鄉開設各種工廠與工程行營生，改變了鄉村的產業與生活型態，各式工廠當中最重要的一種就是皮革工廠，溝皂的皮革工廠以產業上遊的原料處理居多，大多是向國外進口皮革來進行鞣製、染色、乾燥、塗飾等處理，再賣給以皮革原料再加工的服飾與生活用品業者，皮革工廠的產業聚落在溝皂落腳已經三十年以上，廠房設備的建設也始終沒有停

歇，經過漫長的歷程，皮革加工業已經變成溝皂的主要特色產業之一。

但是，隨著近年製程改變與產量擴大，汙染程度也就持續提升，皮革工廠最常被居民詬病的就是其對廢棄物的處理方式，雖然這些工廠的經營者以本地人居多，卻也沒有顧慮對社區親友的危害而作好製程中的廢棄物處理，工廠常把汙泥露天棄置，又習慣將廢水排放至社區的排水系統中，廢水的臭味會隨風向逸散到居住區，雨患時汙染物更會隨淹水四處流溢而影響到農作物與灌溉水源，另外，皮革鞣製過程中的硫化氫也會逸散在空氣中，而削磨過程中的皮屑、噴漆作業時的乙酸乙酯塗料與重金屬鉻會因為廢水與汙泥影響到社區的土壤與地下水源，以上種種環境問題對溝皂居民的健康與生活品質影響甚鉅。

皮革工廠鄰近住家的家具與建築出現嚴重鏽蝕的現象，而且從 2007 年開始，社區開始出現許多呼吸系統與免疫系統的老少病患，於是在里長的召集下，於 2007 年 9 月召開里民大會，各工廠均派代表到場協商並承諾大家將於一年內改善，但是最終卻不了了之。部分居民實在不滿家園瀰漫惡臭氣味，也擔心孩子身體健康，所以組成了社區環保自救會，自救會為了促使社區內的皮革工廠改善其廢棄物的處理，進行如調查紀錄、社區教育、向公部門陳情與媒體曝光...等各項工作。2009 年 7 月，筆者與朋友得知溝皂正發生因皮革工廠汙染所引起的環境爭議事件，進而開始連繫當地居民，並慢慢涉入社區環境自救會的運作，過程中筆者聽到不少居民對汙染問題的不滿與抱怨，也看到社區內外各方用不同的方式試圖處理汙染問題的努力。然而筆者發現整起事件的處理過程似乎缺乏了社區治理的層次，要不就是行政法令的層次，要不就是個體層次的互動，社區成員共享的規範在溝皂也不太明顯且鮮少被運用。

三十多年來，溝皂由純粹的農業聚落演變成工廠林立，又在這兩三年發生工廠與居民間的環境爭議事件，筆者想瞭解這些變化與事件在社區內是如何被理解與處理的，因此透過在溝皂的訪談與觀察，探討其空間利用與產業發展的規範變遷背景、情形與影響。

第二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過往台灣的鄉村發展大多從經濟指標、人力資源、國家立法與公共行政的角度出發來規劃區域發展策略，較少直接深究社區發展治理主體時所遭遇到的限制與困難，近年來雖然政府提倡社區營造的意識，但是仍可感覺到公部門與社區還是缺乏了確實發展社區治理框架的決心與意識，社區營造的政策反而變成另外一種資源分配模式而已。

西方學界開始提出以永續社區發展(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的概念來取代區域發展的思維(Bridger and Luloff 1999；Roseland 2000；Sharp et al. 2002)，政府、企業與社區居民在社區尺度形成夥伴關係，共同來規劃經濟發展與治理議題，並有意識地評估環境、社會與文化等面向的永續性。不過，台灣要具體落實這樣的治理模式有相當的難度，若吾人連「社區」的性質與意涵都未能清楚掌握時，「由下而上」或「夥伴關係」的社區發展模式都將流於空泛而難以落實，因此深入瞭解社區行動者們的價值文化、認知與實踐，並指出發展社區治理應努力的方向與條件，方能促成實質的永續社區發展。

筆者希望透過本論文的研究結果，讓溝皂居民用不同的角度思考社區現況，並逐漸發展出有效的社區治理框架與規範，藉此強化成員的社區意識以及累積社區的社會資本。

第三節 論文章節安排

為了更具體呈現出溝皂規範變遷的情形以及相關的因素，筆者於第一章「緒論」陳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動機、目的與論文章節安排，表明筆者從社會現象出發所產生的問題意識，第二章「文獻探討」中述及研究概念相關文獻的回顧，辨認出本研究在相關學科的定位，並使研究問題與現有文獻進行對話，第三章「研究設計」說明本研究所採用的社區個案研究法以及蒐集、整理、分析資料的策略，第四章「戰後溝皂的變遷」簡述溝皂在產業、交通、資訊與社區結構等的變遷情形，並試圖突顯出社會條件的改變所造成社區內部不均質的情形，並在第五章「溝皂規範變遷之探討」透過經驗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整理目前社區規範弱化的背景、情形與影響，而第六章的「過程-事件分析：皮革工廠汙染事件」則描述作為社區爭議的皮革工廠汙染事件始末，將相關行動者不同的態度與行動策略凸顯出來，並從中探討規範在其中實際運作的情況，最後於第七章「結論」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成果且指出後續研究的方向。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為了釐清本研究所處的社會脈絡與問題意識，本章回顧了過往相關理論與經驗研究的文獻來進行探討，以下分為「鄉村的社會變遷」、「鄉村社區的規範」、「社區意識與社會資本」與「小結」四節來討論。

第一節 鄉村的社會變遷

要深入討論鄉村社區規範變遷的議題，不能離開對鄉村特色與結構的瞭解，必須透過對社會變遷的考察，去瞭解規範變遷的背景。而社會變遷(Social Change)主要是指社會群體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社會文化與社會結構等，隨著時間與各種社會條件的改變而產生的變化(蔡文輝 1983)。戰後以來，台灣鄉村的社會變遷基本上是在現代化(modernization)¹、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與都市化(Urbanization)的背景下展開的，不只改變了社會型態，也對人們的價值觀與行為產生影響。現代鄉村的定義與性質目前仍是現今學界爭論的焦點，謝宏昌(2003)認為關注土地使用與人口密度的機能性(functionality)定義方式越來越無法作為實際認定鄉村性(rurality)的指標，建構性(constructionality)的文化分類原則反而變得益發重要，人們對於景觀、產業與關係的想像與投射決定其意義脈絡中的鄉村意涵，鄉村的意象經由不同行動者共同建構且不斷變動著。

雖然鄉村在不同國家、地區或時代會有非常不同的認定與內涵，但是許多定義鄉村的方式往往隱含計劃發展該地區的企圖(Robinson 1990)，台灣的鄉村定義很大程度上受到都市計劃學者的影響，政府將鄉村地區定義為都市化程度較低的

¹美國學者威廉·哈維蘭(William A. Haviland 1987)把西方的現代化理解為以下的社會過程：

- (一) 技術的發展：科學及技術的進步使人類對自然跟社會生活得以控制。
- (二) 工業的發展：工藝品與農產品可經由機械化大量生產，並透過市場進行交換、分配跟消費。
- (三) 政治的發展：現代政治的特點在於大眾參與的政治過程，不論是革命、法西斯、共產政體或是民主憲政，大眾參與都成為現代政治的特徵。
- (四) 都市化的發展：人口集中於都會區成為現代社會的趨勢，連帶影響到政治、經濟、文化、生活方式等面向。
- (五) 世俗化的發展：宗教的力量減弱，而以理性的邏輯去評量人事物的安排。

地區且深深影響大眾的思維，這種定義方式蘊含了線性發展的想像，只是由於區位與條件的限制，所以停留在未完成的型態而已，這樣的觀點看法充斥在庶民甚至專業學者的思維當中，所以鄉村的發展與變遷往往是在此種意識型態下的產物。

台灣的鄉村社會變遷始於統治者的作為，在日治時期就有政府透過行政、教育與現代化建設等方式控制或干涉鄉村的生活型態與認同的先例，戰後的國民黨政權延續日治政權對鄉村的治理思維，一方面抑制民間結社與公共治理的能力，一方面推動鄉村的現代化與都市化。戰後台灣的發展指導論述往往是西方「現代化理論」與冷戰結構下的產物，但 Escobar(1995)認為西方發展論述以 GDP、GNP 經濟指標來衡量發展程度的作法是很值得商榷的，這種模式建構出第三世界或開發中國家「貧窮」的整體意象，並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貶低其對自我的評價且造成社區連帶與維生經濟的瓦解。然而在過去的發展歷程中，台灣社會並沒有辦法意識到或避免 Escobar 所提醒的問題，並以這樣的眼光去看待國內的城鄉發展議題，所以還是會用單一標準的指標來衡量鄉村的價值，並塑造出「貧窮鄉村」的意象，這影響了整個鄉村社會變遷的軌跡與軸線。

而台灣鄉村的產業變遷與經濟發展，一直以來便帶有計劃經濟的成分，日治時期「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政策就是透過各街庄產業組合、街庄役場勸業課，由上而下指導農業生產與成立農事組合，引進新作物品種、農業技術改良、水利設施、化學肥料的使用。農民也要配合政府對配水、輪耕、收購與作物種類的管理政策(廖正宏、黃俊傑 1992)。國民黨政權推動的土地改革，對鄉村來說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戾點，以地主為領導階層的權力結構鬆動瓦解(楊懋春 1970)，自此，個別農戶的生產跟政府保持密切的關係，即使是自耕農也必須配合「肥料換穀」、「田賦征實」與「隨賦收購」等政策，所生產的農產品也大多交由農會收購，農業的生產、加工、管理與銷售都開始脫離傳統維生經濟的模式，漸漸走入現代化與商品經濟的生產模式。而政府「農業培養工業」的政策方向具體促使農業部門的剩餘轉移到工業部門，農業為國家帶來經濟利益並奠定工業發展基礎的同

時，卻使台灣鄉村由維生經濟的社會轉型為商品經濟的社會，追求外匯與貨幣的目標導向，至今仍深深影響國人的經濟思維。政府為進一步推動工業發展、解決工業用地問題²，於1963年創設六堵工業區，並實行鄉村工業化的政策，稍早的土地改革是這一系列發展政策得以落實的基礎，鄉村工業區的設立是造成鄉村產業結構改變的主因，為鄉村分化的重要因素(莊淑姿 2001)。直到1972年公佈了「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才廢除肥料換穀與田賦附征，農產的自由買賣卻使得農業本身的商品經濟性格更為突顯，鄉村空間利用的方式也產生變遷，大型機具的引進也使勞務合作的型態轉向契約化，也開始出現出賣勞動力以獲得報酬的勞動型態，以維生農業為基礎的鄉村文化逐漸被現代性的生產邏輯所穿透。甚至工商業組織開始進入鄉村地區後，雇傭關係、合股投資與工具理性的商業行為等功能性的關係開始和本質性的初級連帶關係併存於鄉村的社會脈絡裡。

1960年代開始，從鄉村地區熱烈歡迎鄉村工業進駐到長輩鼓勵青年子弟向都市遷徙求學、就業與尋求發展機會，鄉村關係網絡的性質與範圍就已經有別於1960年代之前的鄉村社會了。人口大量往台北、台中、高雄三大都市移動，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往較近的區域中心城鎮移動，1960年代以後的台灣進入人口與空間急劇再分配的年代(施添福 1999)。廖正宏(1985)認為此時的鄉村人口外移帶來兩面的影響，雖然外移者可能為家戶帶來經濟上的收入，但亦會造成世代間經驗的不連續，而外出子弟對於家鄉的參與方式也從生活連續式轉變為片段式，返鄉以後也會發展不同於老一輩的生活態度與認同意識，兩者雖身處同一生活場域且維持著彼此關係的連帶但卻往往依據差異的生活邏輯行事，以溝皂而言，不同世代的切分點大約可以劃在1960年之前與之後出生的差異，1960年以後出生的

²獎勵投資條例(Statute for the Encouragement of Investment)，簡稱「獎投條例」，於1960年8月31日制定，共三十五條，主旨為「獎勵投資，加速經濟發展」，主要內容為租稅減免、工業用地之取得、公營事業之配合發展等。原訂實施至1970年12月31日止，但於1970年12月底修定全文共八十二條，進入第二階段。原訂於1980年底落日，但於1980年底又修定全文八十九條而繼續實施至第三階段，於1991年1月1日廢止而走入歷史，改由促進產業升級條例取代。其內容主要包括稅捐減免、工業用地取得、及公營事業配合發展等三部分，提供儲蓄、外銷、自有資金累積、固定資本累積、僑外投資、進駐工業區等業者及個人租稅獎勵。

人們大多因為生活改善、九年國教³的推動與遷徙機會的增加而較容易有完整的外界經驗，相較起來，1960 年之前出生的人們較可能終其一生以聚落為其主要生活場域而且高度依賴原有聚落的各項資源維生。

葛伯納(Bernard Callin 1979)在 1957 到 1958 年間到彰化的小龍村從事調查時就發現：在城鄉關係方面，居民的農耕已經轉變成通過都市地區的市場交易取得貨幣收入與消費品的經濟型態，都市中心對村莊的接觸與連帶已超過附近其他村莊，形成了鄉村對都市的依賴關係；村庄內部的居民開始將活動與事業拓展到村外，村落本身及其傳統組織對村民生活的影響力降低了，甚至變得一落千丈。村落外關係的重要性漸漸超過村落原有內部的鄰里與親屬關係，互助合作的情形也大為減少，而村裡也缺乏夠資格、有名望的人來領導公共事務。Liao 和 Yang(1979)整理台灣戰後以來的社會變遷，認為教育普及、新農業技術的引進、工業發展、土地改革、交通與傳播媒體發展以及新形態的文化價值等外來影響，改變了人民心智、家庭生活、產業整體、社區結構與關係，這些改變使人們從以村落為主的生活型態走向依賴整體社會分工的生活型態。

³雖然日治大正八年(1919)頒布台灣教育令，推動台人初等教育，但台灣整體教育水準的提升還是因為國民政府於 1968 年 9 月 1 日推動九年國教，不過原有的〈強制入學條例〉是 1947 年訂定的，只規定六歲至十二歲國民之強迫入學事宜，直到 1982 年才修正相關條文取得十二歲到十五歲學齡兒童強制入學的法源依據。因此實質普遍的教育水準要到 70 年代晚期才有較顯著的提升。

第二節 鄉村社區的規範

一、 鄉村社區

社區是外文 community 的中譯⁴，原文源自拉丁文 communis，係指涉同一地理區域內具有明確的共同關係、社會互動、社會意識與社會組織而形成的共同體(徐震 1992)，雖然其概念屢屢被研究者使用作為分析的工具，但是實際應用在學術研究上仍面臨許多的質疑與挑戰，社區能否作為具研究意義的社會單位，或是只是人們的居住範圍或行政區劃分而已，不同的個案顯示出明顯的差異性，不同學者便提出用社區凝聚(community cohesion)、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與集體目標的共享...等來作為衡量社區的指標(McMillan and Chavis 1986；Wulforth et al. 2001；Cantillon et al. 2003)。

從前一節所討論的鄉村變動情形來看，鄉村聚落能否作為一個「社區」來研究，目前遭受到極大的挑戰，個人機動性(mobility)與通訊科技的不斷提升與進步，使得空間的界線逐漸變得模糊而難以劃分(Meijering et al. 2007)，且隨著青壯年以降對社區脈絡的相對化與拓展外部連結的能力增強，形成世代間不均質與差異化的情況。受到Barry Wellman的影響，筆者以社區解放論(community liberated)⁵的同心圓觀點來重新思考「鄉村社區」的意涵，社區的硬核(hardcore)是由擁有強烈社區意識的核心成員所構成，社區意識依賴某些特別的象徵、空間或願景作為認同的載體，從核心成員出發的社會關係網絡向外延伸形成界定社區的範圍。以溝皂為例，社區意識最強烈的就是高度依賴這片土地維生與家族世代定居的居民，這些核心成員的作為主導了社區規範的運作並影響了社區的組織緊密度與範

⁴費孝通 1933 年和燕京大學的學生們翻譯美國社會學家 R. E. Park 的論文時，第一次將英文 community 翻譯為中文的「社區」。

⁵現代社會的地方社區受工業化與都市化的影響後產生變化，有三種不同的論點試圖說明變化的情形：社區失落論(community lost)、社區繼存論(community saved)與社區解放論(community liberated)，其中社區解放論的觀點調和前兩者，由 Barry Wellman 在 1979 年提出來，隨著交通與通訊的發展，社區不再只以地區作為單位，而以拓展開來的社會網絡系統來界定社區，雖然工業化、科層化的社會系統已造成社區鄰里關係逐漸減弱，但相互聯結的初級連帶依然存在且佔有重要性，社區的社會網絡除了內部的鄰里關係，向外亦可以與社區以外的系統作整合。

圍，然而隨著世代的交替與集體目標的改變，核心成員的組成與社區的運作也持續在改變。與這些核心成員有各種關係連帶的居民，其社區意識與依賴程度往往因人而異，尤其青壯年以降的居民向外連結的機會與能力提高，亦可能有其他更優先考慮的社會認同與生活網絡，這時社區對於其生活所產生的意義感就相對薄弱許多，參與社區的方式多以附和與跟隨核心成員為主。一般來說，社區意識的強度決定了社區組織的緊密度，也影響了網絡內的社會資本豐富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歸屬感與依附感並不完全等同於社區意識，社區意識除了歸屬感與情感的分享外，還包含目標的整合、滿足與相互影響的關係(McMillan and Chavis 1986)，現代鄉村的發展目標呈現多元分化的情形，有人關心經濟發展，亦有人關心環境保護與社區照顧，缺乏目標的整合與滿足是現代鄉村社區之所以缺乏凝聚力的原因之一，往往也反映在社區公共規範的不彰，本研究的溝皂現況就是一個值得探討的例子。

二、 規範相關理論

規範(norms)在社會學指的是一組規則的系統，可以區分人們在特定情境中的某種行為是不適當，賦予人們行為社會評價的界定(桑敦 1992)。蔡文輝(1993)認為規範就是每個團體、社區或社會都會具備的，用來作為組織成員間、成員與外界間互動的一種手段。當「鄉村社區」的概念具有彈性與建構性時，社區成員往往可藉由規範的共享來識別與辨認彼此，規範提供成員思考行動時依循的方向與準則，當規範被成員普遍認知到且認為是「對的」且「應當加以遵守」的標準時，不遵守規範的成員就會感受到集體的壓力。根據以上的討論，筆者認為社區內的規範內容與機制是社區關係及社區功能中價值層面的具體展現，可以指示人們或團體應該如何思考與感覺，以及各種情況與關係裡應如何適當行為，因此規範對集體來說非常重要，可以使社區生活中的互動行為有所標準，增加社區成員間的信任感，進而維繫社區關係與功能的有效運作。一般來說，規範包含很多層次與主題範疇，本研究將集中探討溝皂關於空間利用與產業發展的規範運作。選

擇針對鄉村社區的空間利用與產業發展作討論，是因為這區塊雖然在形態上發生明顯的變化，但是在社區的脈絡裡，其實質內涵的改變卻需要更深刻地釐清。

社區裡的規範來源紛雜且包含很多層次，社會學家孫末楠(William Sumner)在 1906 年提出民俗(folkway)與民德(mores)的概念，民俗作為構成規範的重要成分，係指人類群體流傳的風俗習慣與生活方式，在高度同質性與變遷緩慢的情況下，可以促進群體內關係的穩定，違反民俗以遭受非正式的處罰(例如群體的非議...等)為主，在台灣鄉村的情境裡，民俗常與民間信仰的儀式與世界觀混同在一起，在空間與產業的部分，風水、方位與看時辰等就是民俗很具體的表現。而民德為規範中具有社會福祉或足以影響到團體生存的重要部分，若成員違反民德，常會引起大家強烈的反應並賦予道德上的汙名。民俗與民德是在人類各種群體普遍地存在，但是法律(law)似乎只存在具有政治組織的社會形態裡，因為法律必須經由立法者制定、政府公佈而具有合法性與強制力，屬於一種正式規範(formal norms)，相較法律，民俗與民德則比較屬於非正式規範(informal norms)。

往往社區針對同一主題範疇事務，也是混雜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規範來處理。規範主要可分為四種類型：風俗習慣、倫理道德、宗教信仰以及法律，風俗習慣的在地色彩最濃厚，社區的生活經驗經過長期積累，自然而然地形成慣例去規範人們的行為與舉止，這也是人類群體生活中最原始的規範形式，但是這種規範形式也最容易隨著社會變遷或文化交流而有所更動，尤其在成員對外交流越來越頻繁的情況下，風俗習慣似乎有慢慢均質化的趨勢。而倫理指的是人際相處時應該遵守的規範，而道德指的是人類內在的良知判斷與評量是非善惡的標準，這兩者在台灣常被並稱，而且據此衍生出各種社會關係與互動的規範，並賦予與超越界連結的意涵，違反這種形式的社會規範，不一定遭受到國家公權力的約束或懲處，但可能會有良心的譴責、社會輿論的壓力與社會群體的孤立...等非正式的懲罰機制。宗教信仰不僅扮演信徒心靈慰藉的角色，同時還可以利用超自然的力量來約束信徒的日常生活去符合教義、民俗與民德衍生出來的規範。法律則是一系列的規則與程序，通常會經由一套明文的制度來落實工具理性的治理。一般來

說，法律重視規範人們實際的行為，而風俗習慣、倫理道德與宗教信仰往往還牽涉個體動機與理想狀態的典範，所以有時社區的事務或爭議雖涉及法律，但是並不會以法律的方式來解決或處理，而採取依據風俗習慣、倫理道德與宗教信仰為基礎的社區規範來處理。不只實務上是如此運作，連學界亦有學者持類似的看法，蔡墩銘(2010)認為社區應可以自身的規範處理社區事務，而國家司法應秉持「一罪不二罰」的原則，不應再對同一事件進行司法罰，而社區調解雖非法定調解但應視為具有合法效力。在社區治理的方面，蔡墩銘甚至提到應廢除行政村里，居民普選出社區委員會進行社區自治，行使「社區拒絕」⁶的權力來保護社區安寧秩序與居民的健康安全。

那為什麼社區需要有自己的規範呢？以功能學派的觀點來說，規範必須存在，否則社會體系就會分崩離析或無法運作。而社區也需要自身的規範來界定社區關係的疆界，共享規範者就是自己人，反之則不是，若有成員違反規範，有可能被驅逐出社區。因為規範與文化信念是相通的，文化信念界定事物的真實性與重要性，若你不接受這一社區的文化信念，即使你對社區有很大的貢獻，社區仍然不會接受你作為成員(Johnson 2003)。

綜合以上，我們知道規範之於社區的功能是在界定社會群體的範圍，並維繫內部的運作。但是社會變遷的轉型期，人們的社會行為與社會關係產生了變化，出現很多並非原來設定與遵循的模式，此時規範也會隨之作出部分的調整。尤其戰後台灣在產業的變動與空間的重組方面都出現不小的變動，社區內涉及到這些範疇的規範雖以政府法令與程序為主，但實質運作其實仍少不了風俗習慣、倫理道德與宗教信仰的原則在作用，只是這些原有的規範可能已經無法涵蓋所有可能的狀況而容易出現力有未逮的地方。

一般來說，早期鄉土社會中能發揮實質約束作用的是「通過自己人的成員治理」，透過血緣、地緣或功能合理性所形成社會圈或社會單位，協調與約束自身

⁶「社區拒絕」係指社區對於外來的勢力或外人有健康與安全等風險疑慮時，有權可以拒絕其進入社區。

成員共同在公共事務上的合作與符合行為規範(賀雪峰、劉銳 2009)，但現今個體意識逐漸抬頭，規範要能運作順利，亦不可忽略個體成員心理的態度，自我約束(self-enforcing)有可能是經過理性分析的選擇亦可能僅僅只是從眾行為(herd behavior)的結果，謝高橋(1982)認為人們之所以自發遵守規範，主要有下述五個理由：(1)處罰與報酬；(2)教化與內化；(3)習慣性；(4)實用性；(5)團體認同，這五個理由中的第一個講到所謂「處罰與報酬」的層面，這就涉及到集體是否有能力與資源去處罰違反規範的成員，並給予盡力符合規範的成員適當的報酬。除了習慣與從眾的原因外，成員往往是基於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來決定行為，遵守規範的成本低而效益高，就容易使成員持續投入強化規範，一旦資源狀態改變就有可能會影響成員遵守規範的意願。以鄉村社區為例，集體目標的模糊與社會關係的改變使得集體壓力慢慢在減弱，Sampson等 (1997)、Kornhauser (1978)與Bursik (1999) 也指出缺乏社會資本的鄰里沒有能力自我規範以及達到共同價值，因此約束偏差行為與解決社區問題的能力會下降。更何況現在教化的途徑又從家庭與社區的生活教育漸漸轉向機構式學校教育，甚至網路與新聞的影響都大於家庭與社區對年輕一代的影響，而生活經驗與範圍的改變也使得習慣性與實用性的因素降低。考量以上種種改變，可能規範對個體的拘束力會下降是理所當然的事，雖然如此，基於從眾的社會慣性，人們還是不傾向主動公然違反社區裡的規範。但是若有少數打破共識的人用他們自己的方式自行其是，規範對其他人的影響力也會迅速消退(Allen 1975)，其實規範能提供社區成員的是一種相互行為模式的信任感，如果這個信任感被破壞，成員心中容易產生不平衡，對社區付出的意願就會大幅降低而轉為消極。

我們在過去社區研究的成果中，也得知了社區領袖與核心成員的行為往往會變成眾人社區行為的參考基準點，尤其社區內各種非正式領域與正式領域的頭人們，往往在生活中充當了其他成員參考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紛爭仲裁者、規範詮釋者的角色，在社區成員面對新事物與爭議而認為自己缺乏足夠訊息或對自我判斷的信心不足時尤其如此，若在社區屬於核心地位的成員不傾向

維持規範甚至打破規範時，往往會對規範的正當性產生很大的挑戰，反之，處於邊緣位置的成員即使大力倡導破壞規範，對規範本身的影響甚微。前面所談到「鄉村社區」的同心圓性質也在這裡與規範的概念作結合，核心成員被認定為具有較強的社區意識，因此對於規範的發言權與建構來說佔有更重要的地位，其主導建構的規範，往往框架了社區的網絡與實質內涵⁷。

當然本研究探討有關現代的空間利用與產業發展規範時，亦會牽涉到社區以外的系統與因素，因此社區內向外連結的資訊與社會資本分佈的情形也必須被納入討論，因為它們也會限制或加強社區規範的效果。



⁷此看法呼應了 Granovetter (1985)所提出來的鑲嵌(embedded)觀點，任何社會行動都是鑲嵌於行動者所屬的社會結構中，個體的選擇和行動基本上會考慮自身的目的性，也會受到關係脈絡與社會角色所影響，其選擇及其行動結果也會回過頭來影響社會結構，社會結構與人類行為是互相影響的動態關係。

第三節 社區意識與社會資本

經由前兩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在社會變遷的背景下討論鄉村社區及其規範的意涵，必須納入社區意識與社會資本概念的討論才完整。事實上，社區意識與社會資本的確在社區建構與規範變遷的歷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一、社區意識

Kauffman(1959)則指出社區能被視為一種社會互動的場域，當成員強烈地關注這個場域時，便會產生以公共利益為導向的行動，因此社區意識對社區來說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議題。社區意識可以指涉居民在心理上對所居住的社區及鄰里有認同感、一體感或歸屬感，認為這個社區是屬於居民自己的，而居民自己也感覺屬於這個社區，有了這份歸屬感及認同感，居民對於社區的問題會感到關心，而對於社區發展的成功也會感到高興，進而影響其參與社區事務的動機。社區意識作為社區中一種無形的力量，可以促進或阻礙社區發展。

Pooley 等(2005)回顧澳洲西部的四個社區研究後發現社區意識(sense of community)既反映了個人對社區的依附感與歸屬感，也和社會資本有關，於是提出透過社區意識來衡量社會資本的想法，企圖整合社區心理學與社會學的研究成果。McMillan 與 Chavis (1986)定義社區意識為一種成員間具有歸屬感、分享與互相重視的感受，他們歸納出社區意識的四個面向：成員關係、相互影響、共同目標的整合與滿足、情感的共享，而最常被用來測量社區意識的量表是 D. D. Perkins 等 (1990) 所發展出來的 Sense of Community Index(SCI)，現今許多學者皆承襲他們發展出來的定義與測量方式來進行研究。

Bauman(2001)就認為「社區」主要指涉人們一種心理期盼的感覺，人們希望可以在現代性的不確定性中尋求安全感的依靠，因此社區認同與社區意識在高度現代性的社會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學者們認為同儕凝聚、社會支持和工作參與等社區互動和物質環境都和形成成員們的社區意識有關 (Pretty and McCathy 1991; Zaff and Devlin 1998)。Wilkinson (1991)更指出社區認同連結了地方感以及

稱為「家」的承諾，很多人描述到心理的感受時，常強調對地方的依附感或是稱為「根」的空間認同，而這些感受往往都會連結到行動者的自我形象(Bridger 1996；Feldman 1990；Kemmis 1990)。定義成員的疆界提供了歸屬感以及內部成員與外部者的辨識功能(Coleman 1957；Coser 1956；Wilkinson 1991)，成員間的正向關係與互動可以促進集體認同的建構(Luloff 1998)，而共同居住時間的長短也會影響彼此連結與共同感受的強度，反映在對社區環境的承諾、興趣與瞭解程度上(Toney 1976；Goudy 1990；Keenan and Krannich 1997；Liu et al. 1998)。

構成社區意識中很重要的概念是「依附感」，學者常討論社區依附感(community attachment)或地方依附感(place attachment)的議題，Stinner 等(1990)指出社區依附感跟三個面向有關：對社區參與的涉入程度、對社區的情感與嵌於在地人際網絡的親密性，但社區依附感不只與社會互動有關，也有很多學者提醒對自然環境的依附感一樣佔有重要的地位(Brandenburg and Carroll 1995；Beckley 2003)，在環境心理學當中，地方依附感的定義就是人們和環境或地景的連結程度(Altman and Low 1992；William et al. 1992)

學者在研究大眾社會中的社區依附感時提出兩種模型：線性發展模型(linear-development model)與系統模型(the system model)：線性發展模型主要考量人口規模與密度，Goudy (1990)就指出高程度的都市化會增加人口規模與密度增加，人們接觸更頻繁後反而減少可信賴的社會鍊結，對社區生活的心理感受有負面影響，因此限縮了社區依附感(Christenson 1979；Wilson 1985)。而系統模型則強調成員會因居住時間、社會結構的位置和所處的生命階段而有不同的社區依附感(Park and Burgess 1921；Janowitz 1967)，一般來說居住時間越長、處於核心位置與老年居民會有較強的社區依附感。

不過在一個高度分工的社會中，在地社區無法提供居民完整的社會經驗(Bender 1978)，Brown(1993)就指出社區依附感會受到居民的經濟行為、生活消費與就業收入的影響。隨著時代的變遷、經濟產業轉變、交通運輸便利...等工業化及都市化的變遷，使得大家的生活圈及工作圈漸漸擴大，不再拘泥於一個小鄉

村、小聚落，漸漸演變成大都會、大城市，以往的大家庭，也演變成以小家庭為主的家庭型態，對於周遭鄰居也不熟悉，大家開始過著以自己家庭為中心的生活，對於整個社區的關心有限，而人們的價值觀也隨著時代轉變，居民的社區意識也開始模糊且式微（徐震 2007）。

Cantillona 等人(2003)則認為社區意識除了個人情感面向外，也和集體的行動與安全有關，成員社區意識的強弱影響了其為社區付出的意願高低，另一方面，由於領導者對鄉村社區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Ayres and Potter 1989)，領導者的特質與表現也會影響居民的社區依附感(O'Brien and Hassinger 1992)，Wulfhorst 等(2001)就指出社區意識往往建立在成員對集體的承諾上。而社區依附感較高的成員，比較不傾向搬遷離開原本的社區(Beggs et al. 1996；Connerly and Marans 1985；Lee et al. 1994)，廖培珊(2004)利用台灣的資料也證實情感層面的依附感的確會影響居民遷徙的計劃，並在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居住年數較長的居民較傾向不願搬遷。

目前鄉村社區面對文化、政治與經濟條件的轉變，社區意識的內容也可能產生分化，可能偏向關心環境保護、社區照顧，也可能偏向關心經濟發展，雖然說環境保護和社會資本較具有公共財的性質，而經濟發展的利益則較偏向個人與家戶層次，但實際的情形往往並非如此簡單二分，牽涉到居民對不同目標的認知與偏好。因此從更深入的層面來探討社區意識的議題，就會發現不能忽略所置身的社會結構與文化價值的脈絡，Wulfhorst 等人(2001)便提到印地安社區的環境意識便與社區認同息息相關，而環境保護的意識更連結了當地的在地景觀、物種的特殊象徵以及超越社區範圍的族群認同。若是社區本身文化價值呈現分化的狀態或缺乏社區架構下的社會資本，以致無法產生對共同目標的共識，社區意識就可能呈現模糊不清與消極的情況，社區意識的模糊化會導致居民付出意願的降低與社會資本的投資不足。

二、 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近年來十分受到重視且討論熱烈，但是使用社會資本概念進行研究的學科領域、分析層次或研究途徑的差異頗大，因此相關定義非常分歧，有些學者甚至認為社會資本尚為被建構成有效的理論 (Hawe and Shiell 2000)，雖然如此，社會資本還是大量應用在各種不同的研究裡，例如經濟發展政策、健康改善計畫、民主政治發展以及社區發展...等不同領域(Putnam 1993；Kawachi 2002；Mayer and Rankin 2002)。

雖然目前對於社會資本的解釋並未有較一致的看法，但是近年社會資本的相關研究概念往往會參考 Bourdieu、Coleman、Putnam 與林南的看法，Bourdieu(1986)將社會資本描述為一種網絡內存在的資源，可分成實體資源 (actual resources) 與潛在資源 (potential resources) 兩種，這些資源可以為了完成某些目的而被行動者所動員，Coleman(1988)也認為社會資本是一種有助於行動的社會網絡連結，Putnam(1993)更描述社會資本是組織內的信任、規範和網絡，可以用來促進合作行動與提高社會效率，藉此成功克服集體行動的困境，促進健全的民主政治發展，而林南(2007)認為只要是資本就必須符合價值資源投入與預期回收的定義，但社會資本和其他資本不同之處在於其嵌於人際關係與社會網絡資源之中，必須經過社會關係才能得到。綜合以上，葉肅科(2006)簡單定義社會資本為社會性的公益資源與公共財，其來源指涉社會組織的特性，例如社會網絡、信任、互惠性、規範、自主與參與等，社會資本可促進協調與合作以獲取相互利益和社會融合，因此其要素或主要特性包含：社會性 (social)、公益或公共財 (public good)、資源存量 (stock of resources)，以及累積性 (accumulation)。一般社會群體或社區的社會資本係透過概念發展出來的指標(宗教參與、社區參與、慈善、信任與安全感...等)來測量(Bullen and Onyx 1999；Putnam 2000)。

一般來說，社會資本往往需要長時間的投資，甚至可能是好幾個世代慢慢累積出來的，行動者之間具有某種地理聯繫或社會關係的網絡，互相體認到彼此合

作所產生之集體效益，並透過規範機制建立信任感來延續彼此的合作關係。因此，關係網絡的開放性與穩定性、規範的有效性都會影響社會信任與合作關係的持續性，也就是直接影響社會資本的豐富程度。愈是封閉的網絡結構，參與者之間同質性的程度也就愈高，使得信任感容易建立，開放性網絡的內部關係雖不如封閉網絡來得綿密，卻也可能因為創造出其他形式的社會資本，反過來對原有網絡產生正面影響。而社會的變遷與訊息的快速流通也會造成行為模式的複雜化，這時的社區就會很需要行為的共同標準（Dayton-Johnson 2003）。

因此，規範的有效性在社會資本的概念裡變成重要的構面，在規範具有一定約束力時，參與者的行為往往容易被他人所預測，不僅可以限制個體偏差行為的降低外，更有助於網絡成員共識的凝聚。Serageldin 和 Grootaert（2000）認為網絡必須有其規範，才可以抑制成員的投機行為，違反者必須受到來自同儕排斥的壓力，並影響其日常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信任感才有可能建立。規範並非總是一成不變，Fukuyama（1995）認為雖然團體公認的價值與規範往往是透過像宗教、傳統或歷史慣習的文化機制而傳遞，不過具有高度信任度的組織即使面臨變遷與困境，仍能順利透過創新來因應。

總結來說，社會資本具有結構（structural）和認知（cognitive）兩種面向，結構的面向包含社會網絡、規章制度及階層關係等客觀事實，而認知的面向則包含態度、共享價值、信任及規範等，它是行動者透過社會互動所產生的主觀結果（Grootaert and Bastelaer 2002），兩者相互影響而產生綜效。Evans（1996）看待社會資本對社會的影響時，更著重整體社會結構、公共角色與制度性的支持，認為社會連結如何被組織起來與運用是關鍵性的原因，Brehm 和 Rahn（1997）則發現信任程度的高低與對規範的認知，會直接影響網絡的結構與參與行為，因此我們知道在結構與認知兩種面向協調時，才能使成員們產生繼續投資的意願。

社會資本的概念在社區研究中十分受重視，Brehm（2003）指出社會資本能夠強化社區內的人際信任與資源整合，並可以藉由合作去改善社區的貧窮問題，在健康促進與社區發展的議題上，社會資本被假設為能促進社會凝聚，使社區能面

對技術、經濟與社會的快速變遷，而有較好的發展表現（Reidpath 2003；Jensen 1998；Krishna and Uphoff 1999），Sampson 等（1997）發現社區暴力問題的發生率往往與鄰里相互信任程度以及公共利益的投入意願呈現負相關。因為社區往往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所以社區的社會資本往往鑲嵌於特定的空間地域，常見的形式為鄰里（neighborhood）的情誼，一般來說，社會資本被認為對社區整合來說非常重要，社會資本會影響社區意識的凝聚，根據澳洲的一項有關社會資本的研究指出，社會資本是發展社區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缺乏社會資本的社區沒有信任感及互惠關係，也無法建立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Bullen and Onyx 1999)。

而社區關係的界線、參與與排除議題也會影響社會資本的情形，Fukuyama(2000)和 Ostrom(1990、1996)認為社會資本會被團體大小、清楚的成員界線、持續的穩定性以及分享文化所影響。Fukuyama(2000)更指出若沒有清楚的界線，社會成員將不敢投資社會資本，除非人們進行不當行為時，能夠被其他人指認、指責與羞辱，否則社區成員間的信任將難以被建立，進而影響到經濟與社區的發展。Rose(2000)也認為社會排除對於社會資本的建立十分重要，社區必須擁有有效的公共制度與規範，才会有豐富的社會資本(Sampson 1996)。Barbalet(2000)認為社會資本建立在成員與社會制度之間的互信關係，清楚的成員身分與角色正是體現社會資本的一個範疇，有助於累積公共資源從而提升社會資本。

另一方面，許多學者也指出成員運用社會資本的能力往往並不均質，有時甚至會對其他成員產生負面的影響或資源的剝奪，而強化社會的不平等(林南 2007)，而且社會資本要作為社區的公共財(communal goods)，必須依賴有效的規範機制，例如獎懲機制與成本高昂的退出行為：如果無法有效懲罰違反規範的優勢成員，或者優勢成員可以在即將受到懲罰時，以很低的成本退出社區，但是其他成員遷徙到其他社區的成本卻相對很高的話，容易形成優勢成員對其他成員的剝削關係（Levi 1996；Abel 1995；Habermas 19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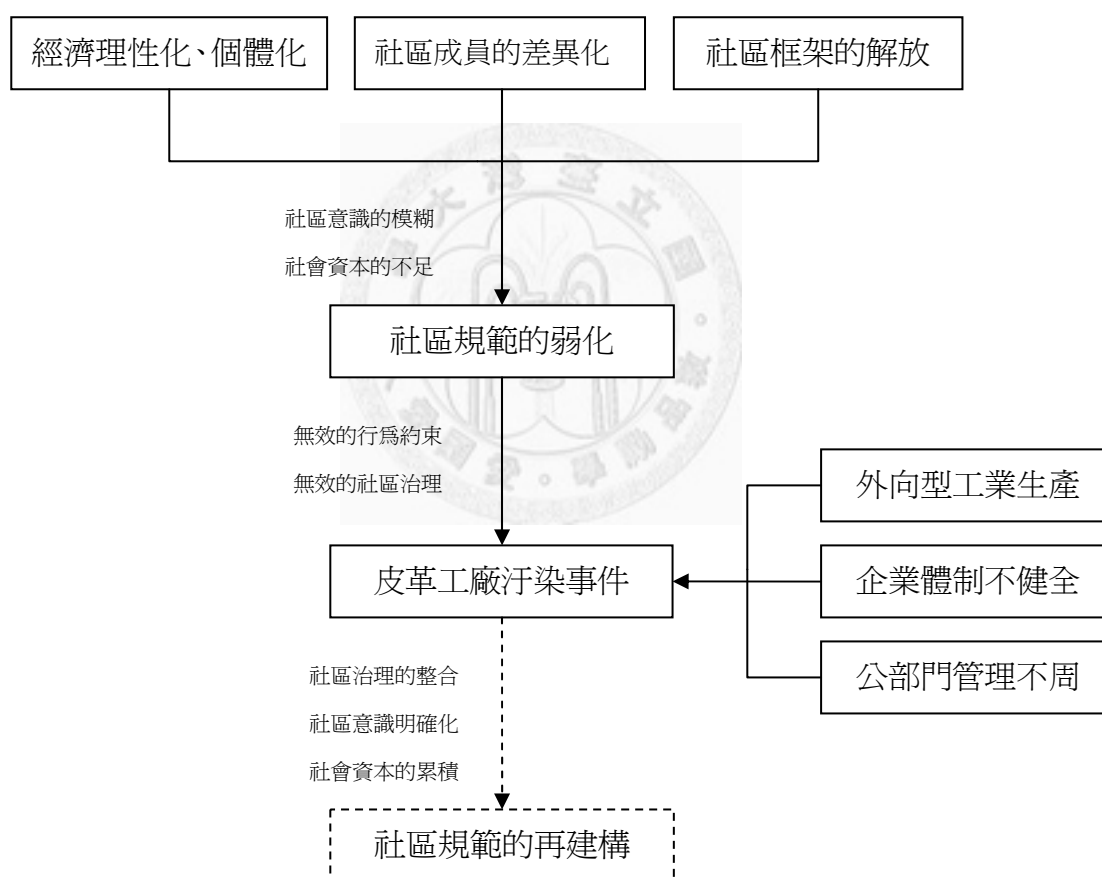
前述所提到的社會資本黑暗面與風險性，有學者稱為社會負債（social

liability) 或反社會資本 (anti-social capital) (Field 2003)。Fukuyama (2000) 也認為缺乏明確規範的社會資本對於社區培力 (empowerment) 與社會正義有抑制而非促進效果。Wakefield 和 Poland(2005)就曾經以批判觀點來考察社會資本的概念，認為組織或團體的社會資本不能脫離其所處的政治與社會結構，研究者應該更關注於其中權力不平等與公平正義的問題，不能只考慮社會連結的面向而已 (Poland et al.1998；Wilkinson 1994、1996)。許多研究已經發現許多負面的外部性，如暴力幫派、極端的種族主義團體等對非屬該團體的個人或社區產生非常大的傷害 (Hagan et al. 1995)。另一方面，內部成員之間擁有資源的情形常不對等，所以動員社會資本來達到其目的的受惠程度也有顯著不同，甚至會有不公平的現象產生，強度高的社會連結並不必然會提升平等性，有時反而會增強了社會剝削 (Fainstein 2001；Navarro 2002)，此時社區內的衝突也並非全然沒有好處，有時反而可以使結構性的不平等浮現出來 (Alinsky 1971)。



第四節 小結

現代化與工業化的社會變遷使得鄉村的產業、生活型態乃至社區結構出現了不均質與差異化的情況，此時若要定義「鄉村社區」的性質與範圍，便只能從關係網絡中的社區意識與社會資本著手，而且反映在規範的具體運作上。我們知道目前空間利用與產業發展是建構「鄉村性」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因此本研究透過呈現出溝皂這一區塊的規範變遷，進而深入探討鄉村社區治理的困境與契機。



第參章 研究設計

為了深入探討鄉村社區的規範變遷，本研究將使用個案研究法中的社區研究，具體操作上運用觀察法、訪談法來蒐集溝皂的相關資料並編碼分析之，本章將分成「社區個案研究」、「田野地點說明」、「研究架構與流程」與「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四節來討論。

第一節 社區個案研究

個案研究(case study)是一種研究策略，面對複雜的議題與現象，研究者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個案來蒐集資料與分析，以求得深入的瞭解，個案可以是一個人、家庭、機構、族群、社區、學校...等，甚至可以是一個事件、一組問題...等，個案研究依研究特性可使用質性或量性的研究方法，資料的來源也可以很多元，舉凡文獻資料、訪談、觀察與實驗...等都可能使用。

社區研究(community study)是指研究社區的生活、價值體系、結構、功能、問題與變遷...等，社區研究常常使用個案研究的策略，把社區視為一個整體或體系，以參與觀察法、訪談法、社會測量法、內容分析法...等進行資料蒐集。

二十世紀初期，從美國芝加哥學派 E. R. Park 等學者開始，他們進行了大量以移民與有色人種社區為主的社會學研究，但這批研究多以都市社區或市郊社區為主，其他如 Galpin、Sanderson、Sorokin、Zimmerman...等學者則更是一開始就投入於鄉村社區研究，慢慢地也有很多各領域的研究者開始以鄉村社區(rural community)為單位進行研究，研究高速公路、收音機、汽車進入、年輕人離鄉背井所造成的影響，而本論文也是針對鄉村工業化對鄉村社區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

此外，另有一批從事鄉村實地研究的學科傳統就是人類學，受限於研究單位的限制，他們多由一個部落或村庄開始著手進行民族誌研究，然而整體來說，人類學者真正關注的往往是整體的族群或區域的文化結構，個案村落本身的地位並不特別突出，即使如此還是留下很多具體的研究成果。

中華文化圈的人類學家與社會學家於二十世紀初開始提倡「社區研究」，楊懋春、吳文藻、費孝通...等學者就為其中代表性人物，費孝通《江村經濟》一書就以村庄內部的社會結構去探討社會變遷的動力，希望對中國的社會性質探討有所貢獻。但從個案鄉村的「地方知識」切入，要如何銜接對民族或國家層次「整體性知識」的探討呢？費孝通(1990)認為透過「類型學的比較研究」可以呈現出中國鄉村的多样性與面臨現代化的處境。而楊懋春作為鄉村社會學者，也常用社會變遷的發展與社區現象相互對照比較出整體性的觀點，而且強調鄉村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結合。

在台灣的學術脈絡中，除了受到來自中國的學術傳統影響外，日治時代進行的大量民俗學研究也提供深厚的基礎，這些研究也有很多是以村庄與部落為單位的，而冷戰時期，西方學者因為無法進到中國進行研究，就以台灣鄉村作為其研究的替代田野點，學者陳紹馨便發表過〈中國社會文化變遷研究的實驗室：台灣〉表達此類看法，而 Ahern、Gallin、Cohen、Pasternak...等西方學者也抱持著這種看法，然而台灣的特殊性隨著更多研究也慢慢地浮現出來，像謝國雄在坪林進行的社區研究也慢慢回應了這個問題，直至今日，台灣鄉村社區的個案研究也許該好好思考如何和原有的學術傳統對話並好好定位自身在學術領域的位置。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的研究策略，但是這個個案必須定義清楚，研究單位是指溝皂這個社區，還是皮革工廠污染事件這個事件，筆者在這裡釐清本研究的定位，本研究的研究單位是溝皂這個鄉村社區，而研究主題主要是聚焦在「社區規範」，而透過分析溝皂社區發生的皮革工廠污染事件來說清楚這個主題而已，雖然如此，筆者選擇皮革工廠污染事件也不是毫無理由，因為筆者認為對溝皂來說，這事件絕對是攸關社區是否能永續的重大事件。

第二節 田野地點說明

本研究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目的是為了深入瞭解溝皂這個鄉村社區的社區規範，而為什麼選擇溝皂作為研究的田野地點呢？因為本研究所探討的主題是鄉村工業化、社區規範與社區治理的相互關係，所以必須去找到存在著工業聚落的鄉村社區，而且這個社區又必須符合以下幾個考量：首先，該社區不能太過具有地理或產業的特殊性，以免研究成果無法和其他鄉村地區產生實質意義的對話，第二，該社區剛經歷過或正發生與工業相關的爭議事件，可將研究主題聚焦在該事件的 analysis 上，第三，這是筆者身為研究者必須誠實與認真面對的，筆者相當擔心溝皂的存續與居民未來的生活，因為筆者有很多朋友居住於此，所以筆者選擇了「溝皂」作為本研究的研究個案，以下針對溝皂的一些基本資料作簡單說明，關於產業與社區結構的變遷歷程將於後續章節進行詳細討論，就不在此節裡贅敘。

一、地理位置與水文

溝皂位於北港鎮北方與元長鄉交界處(見圖一)，鄰近草湖、西庄與番溝等村落，鄰近省道台 19 線。溝皂里地勢平坦，海拔高度不及五公尺，屬嘉南平原的一部份，地表覆蓋了粘板岩沖積土，是由濁水溪的沖積物沈積而成。而在氣候上，由於距離北回歸線約 16 公里，屬副熱帶性氣候，夏季多雨、冬季乾燥多強風，每年秋冬之際，清晨常有濃霧籠罩。



〈圖一 北港鎮行政區圖〉

資料來源：《從笨港到北港》，雲林縣政府編印。

溝皂以前是北港溪流經的地方，故社區多有池塘遺址，但目前多填平作生產或居住使用，公廟真武殿前後的大小水池都是北港溪的舊河道遺跡(見圖二)，嘉南大圳流經溝皂南面，又有頂寮大排與龍岩中排等排水系統流經境內，社區內的皮革工廠也都臨近這些排水系統來設立。



二、 歷史沿革

北港地區開發甚早，在清代稱為「大棟榔東堡」，溝皂庄為堡內三十三個街庄之一。關於「溝皂」地名的由來，根據《北港鎮志》的記載，是因為村落建於細長的水溝邊，水溝又稱為「漕」，而「漕」與「皂」諧音，故訛誤為溝皂。

在日治時期，溝皂庄前後屬於斗六廳、嘉義廳與台南州的管轄範圍，戰後溝皂庄與奄豬社庄被合併為溝皂里。溝皂里在北港 28 個村里中，面積排名第一，全里面積約 5.6 平方公里，劃分為 13 鄰，其中 1 至 12 鄰為溝皂聚落，奄豬社為第 13 鄰，但本研究的研究對象是以自然聚落為基礎的「溝皂」，而非行政單位的溝皂里，故去掉第 13 鄰的奄豬社。

三、 人口結構

溝皂里戶籍上的人口總計 481 戶 1447 人，男性 818 人，女性 629 人⁸。但近年來，青壯年人口不斷流失，所以真正居住者約一千人左右，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得扣除奄豬社(13 鄰)二十餘戶一百多人，溝皂聚落的居民數大約八百餘人。其中的姓氏分布，以蔡姓最多，約佔溝皂居民的五至六成，翁姓次之，其餘尚有李、吳、黃、鄭等姓氏，其中蔡姓、翁姓、李姓有較密切的姻親關係，而蔡姓內部則又分峰山、青陽等不同的堂號，不完全屬於同一宗族。

年齡結構方面，以老年人口為主，估計約六百餘人，其他尚有未成年人口一百餘人與青壯年人口兩百餘人。雖然近五年因為外界景氣不佳，有部分青壯年居民回流，但是仍未能改變以老年人為主的社區年齡結構。

四、 居民生計

基本上來說，溝皂具有相當的農業條件，五穀類一年可獲兩期，在地作物以稻米、花生與蒜頭為大宗。老年人口從事農業者尚有八成左右。青壯年因為不像老年人可月領老農津貼六千元，所以全職務農要養家不容易，大多從事附近地區

⁸資料來源：2010 年 4 月人口統計資料，北港鎮公所全球資訊網。

的臨時性或包案的工作如工程、鐵木工、農工或在各式工廠上班，但也在業餘時間從事家戶的農務工作。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地的特色產業：皮革加工業，目前當地有七家以上的皮革工廠，約有數十人從事皮革相關產業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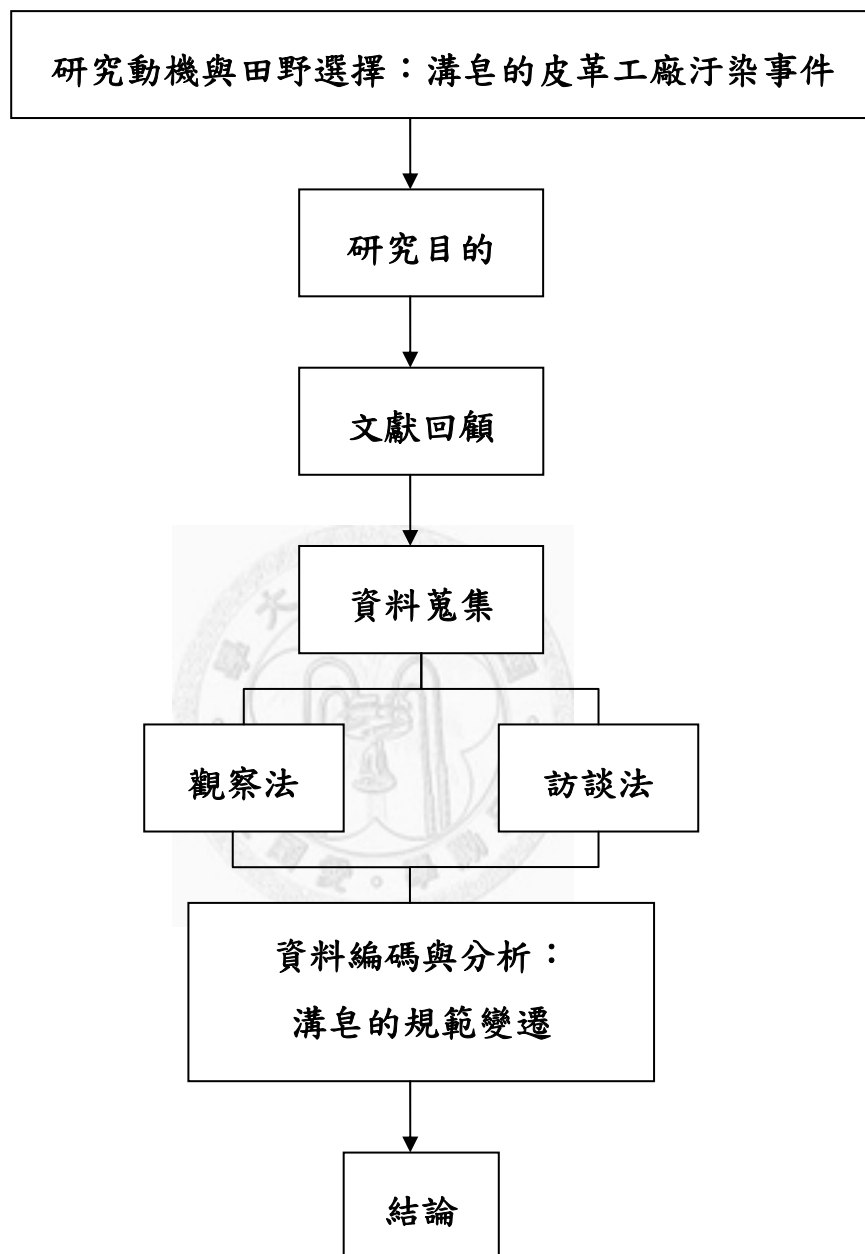
五、 地方信仰與社區組織

真武殿是溝皂的庄頭廟，主祀的玄天上帝聽說是由蔡姓雜貨商人由唐山所帶來的，早期用竹架草棚搭建臨時神壇祭祀，直到戰後農村經濟改善與外出子弟捐款，真武殿才又在 1978 年(民國六十七年)興建廟宇，據說目前是全台最大的玄天上帝廟。此外，廟埕設有溝南與溝北社區發展協會暨活動中心、老人會等社區組織在此運作，廟後方亦有一休憩公園，常有社區居民會在這一帶附近活動。

由於溝皂鄰近北港朝天宮，居民也會參與朝天宮的活動，五年會有一次迎媽祖與迎王爺(馬鳴山五府千歲)的繞境活動，繞境活動維繫著庄頭地理疆域的認同，前後幾天都還是會有熱鬧宴客的景象。溝皂還保有古早迎神遶境時護駕的宋江陣，只是宋江陣過去是透過武館傳承，武館現已解散，現在只能透過東榮國小學童課餘的練習來勉強維持。在地的東榮國小在溝皂建校已逾五十年，惟現今人口外移嚴重，所以只剩下約六十名學童在學就讀，然而仍是社區裡中生代時常聚集討論的生活中心。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具體操作的流程如下：



第四節 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一、 資料蒐集的過程

本研究資料蒐集的內容主要圍繞著下列的概念範疇與指標：

概念範疇	相關概念	指標
鄉村社區	社區規範	運作的網絡
		內容的認知
		約束與處理的機制
	社區意識	成員對集體情感的認同
		成員對空間環境品質的認知
		成員對社區共同目標的認知
		成員對社區事務的付出意願
	社區的社會資本	成員對彼此的信任程度
		成員對制度的信任程度
		成員間聯繫的緊密程度
		運用於達成社區目標的資源

筆者整理自相關文獻。

筆者一開始進入田野的方式是始於 2009 年 7 月參與當地環保自救會開始，認識了當地居民，並在他們的協助下在當地租屋與引介訪談個案，而筆者每週一到五晚上在社區信仰中心真武殿的廂房從事針對小六到國二的社區課輔，並因為如此，認識很多不同背景的社區居民，也參與他們的生活，更透過日常訪談瞭解許多非自救會成員的看法。資料蒐集的方法主要整合了觀察法與訪談法，將觀察所得的資料整理成田野筆記，再跟訪談資料的逐字稿與編碼相互對照。

(一)觀察法

為了研究此主題，筆者選擇一種參與式的觀察法，也有人稱作田野研究(field research)，主要是希望觀察人們在自然情境中的日常生活，嘗試捕捉所謂的「在地觀點」。

在進行以觀察法的研究時，很重要的是觀察後的紀錄工作---田野筆記，筆者的田野筆記大致可區分為以下五個區塊：

- (一)現象的描述：這部分包含了人、事、時、地、物與行為互動的描述。
- (二)主題與理論詮釋：對前述現象的初步歸類與既有理論的對話。
- (三)研究者的感受與反思：觀照自身在田野場域中的感受，並反思分析視角、方法與倫理...等的衝突與困惑。
- (四)研究策略：針對前述的詮釋與反思，訂定下一階段的研究策略與工作步驟。
- (五)留白：供日後編碼、評論或補充記錄...等。

透過田野筆記，在研究過程中協助筆者維持田野時的敏感度，也作為後續分析階段編碼的重要基礎。

(二)訪談法

由於當地行動者習慣人際傳播，較少使用文字，所以留存的文獻史料有限，本研究必須大量依靠居民對記憶的訪談結果作為資料來源。而且訪談法除了涵蓋客觀的外在行為事實外，還可以兼顧受訪者主觀的內在感覺與態度，這對於本研究所探討的社區規範議題尤其重要，因為社區規範的議題除了外在的行為事實外，也應該深入去瞭解行為背後的價值理念與自我評價，才不致對資料解讀失真。

而本研究所採用的訪談方法是一種建基在觀察與文獻為背景의半結構訪談法，先透過對社區現況的觀察與既有文獻的比較呈現出大致的主題與方向，依此規劃訪談大綱(見附錄一)，並依可能的背景與態度篩選出具代表性的個案進行訪談(見附錄二)，除了里長、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社區領袖外，筆者也訪問立場差異最大的兩端：自救會成員、皮革業者，並且也兼顧性別、年齡與居住角落等

差異，訪問了十餘位一般居民、工廠員工等，期許能突顯出資料同質與異質的特性。取得受訪者同意後，筆者會在訪談過程進行錄音紀錄，並於訪談後以筆記摘錄該次訪談重點。

值得注意的是，當筆者使用訪談法去蒐集居民對其歷史事件記憶的敘述時，必須十分注意其記憶極可能是選擇性、扭曲的或是錯誤的，因為每個群體都有其特殊的心理取向，回憶往往是基於心理傾向去使當前經驗印象合理化的機制，是一種對過去的建構。王明珂(1995)認為口述歷史研究必須特別關注：(1)「過去」如何被集體選擇、重建與遺忘；(2)身分認同與記憶的關係；(3)不同受訪對象所記憶的「過去」時間、空間結構；(4)個人的過往經歷如何被記憶與敘述；(5)人們對特定事件的不同記憶與詮釋；(6)世代間的記憶傳遞與失憶。

因此，除了把訪談結果詳實記錄下來外，對訪談所得的結果也必須進一步求證，除了歷史事件的年代與背景是否正確外，辭彙內涵的改變與內容的前後矛盾都是需要特別注意到的，因為不論是記憶模糊、社會變遷後的價值改變...等，我們都要去判斷此狀況是普遍性還是有其個人因素，尤其本研究探討的是「社區規範」這一集體層次的概念，資料卻建立在單獨受訪者個體層次的訪談上，因此必須透過相同的事件與時間點，作為不同受訪者之間比較差異的概念平台，才掌握得住研究分析的可能性。

二、 資料的整理與分析

要整合田野訪談與觀察的資料，並適當地與理論作對話，就必須作適當的概念分類，初步先以(1)資料的類型(觀察或訪談)；(2)資料的背景(提供者、情境、時空...等)整理出可閱讀之文本，再從中萃取出與概念範疇相關的主題，另外判斷其所涉及的空間、社會關係的層次與時間上的定位，將其組織在多層次的年表上，尋找其中相互影響的辯證關係與意義性，作為初步的研究結果。

具體分析與詮釋的研究途徑，是以「過程-事件分析法」進行，孫立平(2001)在研究國家與農民的關係時，提出「過程-事件分析法」的研究策略，將社會事

實看作是動態的、流動的，有別於過去僅是用一種靜態的結構與關係去研究，針對研究對象發生的個案事件的具體過程去作深度描述與理解，關注事件中每一行動主體的複雜面貌，嚐試捕捉「結構上不可見但存在」的細微互動過程。而此分析方法剛好適合本研究以社區歷史變遷為綱與爭議衝突事件為本的研究設計，並且社區規範與社區內居民的互動與詮釋息息相關，人的行動是會對社區規範產生直接且深遠的影響，所以採用「過程-事件分析法」的研究策略來研究構皂的規範變遷。



第肆章 戰後溝皂的變遷

本章整理溝皂居民口述訪談資料，將戰後以來的發展歷程分成三個相互關聯的範疇，進一步來瞭解社區規範變遷的背景：首先討論產業與經濟發展的變遷，接著是交通、資訊與價值觀的變遷，最後探討各領域變遷對社區結構的影響。本章的討論若有牽涉到年代與歷史事件，請參考溝皂歷史年表(附錄三)。

第一節 產業的變遷

溝皂的地理位置位於北港街區之外，但是它的產業卻跟北港街區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要討論溝皂的發展史，必須先從整個北港地區作為背景講起。

根據雲林縣政府編印的《從笨港到北港》一書裡面記載，北港自十七世紀顏思齊等人率眾開拓以來，便一直是台灣與大陸沿岸之間交通來往的重要口岸，有「小台灣」之稱。北港的優勢是位於笨港溪（今北港溪）出海口，而且港口地形便於迴避官兵盤查，所以成為先民移墾臺灣渡口之一。1694年，僧侶樹壁自大陸湄洲奉請媽祖來臺，並於1700年建立笨港天妃廟，也就是今日北港朝天宮，這件事雖是宗教事件，亦有產業上的意義，至三百餘年後的今天，香客絡繹不絕所帶動的「進香經濟」不容小覷，也因此北港的傳統民俗活動、古法農產加工等都保留地非常完整。

而商業貿易方面，笨港依畔笨港溪而興起，地理形勢良好，郊行林立，康熙年的諸羅縣志記載「笨港街，臺屬街市，此為最大」，當時主要的郊行有泉州郊、廈門郊、許姓的龍江郊等，此外糖郊、米郊及船行、油車亦十分興盛。由於商旅往來頻繁。清雍正至乾隆中葉是笨港地區發展最快速的時期，笨港街隨人口增加，行政上被劃分為南、北二堡，北街屬大槿榔東堡，南街屬打貓西堡，但對外仍合稱笨港街。笨港街的貿易繁興，也帶動地方繁榮，1893年，北港街區發生大火，毀商店民宅近五成，致使商業衰頹。隨後日本治台，將北港與南港分治，北港隸屬台南州，設北港郡。南港庄歸台南縣嘉義廳管轄。而且日本興建高雄、基隆等港，逐漸將閩台貿易轉化為日台貿易，貿易權也幾乎全由日人控制，北港

的港口貿易地位一落千丈，但是北港仍繼續維持興盛不衰，主要原因有三：(1)朝天宮的進香經濟；(2)北港為附近地區油、糖及農產品貿易的集散中心，尤其油業居全台之冠，俗諺說：「油價北港定」；(3)日本人 1910 年投資興建的北港糖廠所帶來的經濟效應。這種情勢一直延續到 1960 年代末期前都還是如此，B4 先生從 1943 年出生後便居住在北港地區，他回憶從光復初期到 1960 年代末期的情況是：

北港位於縱貫公路南來北往之地...那時候北港是四大鄉鎮之一，所謂的四大鄉鎮就是北港、鹽水、豐原與新營，那時候的工商日報還有一欄「北港行情」，大家都說北港今天說要漲一塊，全台都也得跟著漲一塊，是到沙拉油研發出來才整個崩下去...那時候台南有四家戲院，北港街區也有四家戲院，所以你知道有多盛了吧...那時候大家把甘蔗交給糖廠，糖廠就會開一張「糖單」，那時候的糖單就好像一種期貨一樣，可以喊價買賣，人稱「博糖賭」(台語)，後來民國五十幾年時，政府才禁止...

(B4, 2010)

而日本政府也在北港地區積極推動現代化政策，設立現代化學校、修築嘉南大圳、設立銀行、組織農事組合、興建街役場（鎮公所）、厚生院（衛生所）、自來水廠等公共設施，並於 1934 年建北港大橋連繫與嘉義地區交通，種種建設集中於北港街區，所以使得北港附近的鄉村地區都必須和北港街區形成很強的依存關係，溝皂也不例外。

簡敘北港地區的背景後，我們可以瞭解到北港街區的新式糖廠興建以後，溝皂就大致可分為種植甘蔗與種植五穀，種植甘蔗雖然可以省去照顧的人力與農藥、化肥等成本，但是由於年只可一穫，且隨著收購價格變動而不能保證有所收益，所以居民都會兼種或輪種五穀、雜糧、地瓜...等作物，早期的農民即使種植稻米，也不捨得自己食用，大多拿到街區出售，而自己多吃番薯籤之類果腹，而

地瓜除可以當作糧食外，亦可以作畜牧的飼料等多功能的用途，花生、胡麻則是很重要的油脂來源，北港在 1969 年以黃豆為原料的沙拉油開發出來之前，一直是油業重鎮，所以一直需要大量的油脂作物。在光復以後二十年間，普遍居民的生活是非常困苦，而且需要負擔政府很多稅負，現年 75 歲的農民 B5 先生提到說：

民國三十八年...到五十八年，這二十年過得非常地困苦...那時候也還沒有瓦斯、也沒有電，撿那個柴回來燒飯燒水...那時種甘蔗的人比較多，農地有一大片的甘蔗園，去給人家割那個葉子回來燒水。民國四十八年發生八七水災，然後還要更壞，一直壞、壞到非常的糟，直到民國五十八年以後，才漸漸改善...而且中華民國的稅收負擔比較重，要收水租、大租，繳不出來，早期常看到法院來庄裡面查封...

(B5, 2010)

大抵 1960 年代以前，溝皂的居民基本上都以從事大宗作物維生，貧富狀況相近，生活的重心也都在自家農地，由於同一角落的人田地往往相近，所以常會在農地裡交流情誼與意見，這就是農忙時期的社會互動，直到農曆三月左右才會有祭祀宴客、陣頭、公戲的熱鬧場面：

當時候的人，因為經濟不好，所以每天都會去田裡打拚...通常都很晚了才回家...打拚很累，怎麼會知道要娛樂、要玩、要四處走走，不可能啊，也沒有機車或甚麼交通...大家沒時間來往啦，去田裡工作才有跟人來往...都在田裡來往，每天都在田裡，都很熱鬧，都在拔草啦。那時候沒有殺草劑啊...嘉南大圳的水來，分區放水，不去顧著大家都搶著要用水，現在就不用了，都用地下水，田裡也都沒甚麼人...

(B5, 2010)

但到 1960 年代以後，商品經濟與現代生產的模式慢慢崛起，從外銷農業、

農產加工、農業機械化與科學化等方面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趨勢，溝皂開始出現薄荷油廠、碾米廠、成衣廠...等各種非農產業，在農業方面也出現不一樣的作物，提供外銷的洋菇、木耳等也開始大量出現，盛極一時，甚至在溝皂還設立菇類的集貨站，但是由於 1978 年的台美斷交，開始使洋菇與木耳外銷管道出現問題，在溝皂的種植面積就慢慢減少，而 1986 年的韋恩颱風更是重創北港地區，所以集貨站就在那時收起來了。

1970 年代開始陸續出現「包工-工資」的經濟模式，對經濟收入的看法也漸漸走向以「個人-家戶」為單位，溝皂居民除了農業，也開始到處從事水電、建築與工程相關行業，有擔任工頭與師傅的，也有只是擔任小工、零工，半農半工的生計模式就從那時候開始大量出現，溝皂青年 D7 就回憶說：

那個時代錢比較好賺..有句話叫台灣錢淹腳目..以前我爸爸在做鋼筋..做一個星期就可以買一部車...一個工程五十萬、一百萬地在包，我們西螺那間房子要一千多萬，就是這樣賺下來的...

(D7, 2010)

皮革工業也在 1970 年代開始興起，一開始是居民黃番薯在自己家從事狗皮、牛皮、兔皮與蛇皮等皮革加工業，當時比較類似家庭加工廠的方式，雖有排廢水入山寮窟的問題，但比較沒被大家重視，主要是因為產量低所以污染量也相對較低。直到 1975 年，黃番薯於現在天嵩皮革工廠的位置建了溝皂第一家皮革工廠，從家庭加工廠正式走向工業組織的經營模式，而後其他居民陸續也開了昌陽、林旺、益榮、煌典、億昌等工廠，這些工廠也是慢慢和行政法令與現代生產的邏輯接軌過渡，並非一步到位，這些工廠早期都沒有申請完整的工廠建地與立案登記，像昌陽是到了 1978 年而煌典是 1984 年，林旺和益榮則遲至 2002 年才進行工廠登記。當時這些工廠和居民的關係並不差，因為早期的皮革製程機械化程度不高，需要很多人力，工廠就會雇用農閒時的男男女女來幫忙，使之領取日薪補貼其家用。而且在 1980 年代中後期，溝皂其他產業的工廠幾乎都倒閉或外

移，只剩下皮革工廠繼續營運，遂慢慢成為當地一枝獨秀的特色產業。

皮革工廠全都是在本地人所設立的，那時候法規比較沒有那麼完整或是執行比較沒有那麼嚴格，所以比較多便宜行事的作法，如廠址、工廠登記、排放等，而且經營的模式往往是先由家庭式，再慢慢向銀行貸款、親友集資再購地擴大為工廠的：

三十幾年前沒有外地來設廠的，都是在地的...技術學起來之後，就回來自己設廠...當時農地可以申請，申請許可如果通過，他就可以蓋工廠...那時候還沒有工業區 ...再來就私底下去蓋..後來如果政府檢查，沒有申請的就是土地違作，那就算地下的、沒有牌照的...當時都是從小間工廠慢慢經營起來，才去比較靠村外的地方，買地再去蓋工廠...

(B3, 2010)

後來溝皂之所以有外地人來經營皮革工廠，多是因為工廠廠房與設備轉手頂讓或拍賣所造成的現象，1989 年之後黃番薯的工廠轉了幾手後，由原籍新港的 C1 頂下來經營，而 1990 年前後，昌陽皮革公司向銀行融資後倒閉，工廠法拍後流標，昌陽皮革公司老闆的弟弟成立鴻和皮革公司來租用營運，但後來 2007 年銀行又遭法拍，讓來自水林的許清潭⁹所經營的大勝皮革公司買下工廠經營。從他們開始接手經營後沒多久，陸續引進新的技術與生產製程，也剛好適逢高雄、台南許多皮革工廠被環保單位檢肅與勒令停工，所以訂單的數量持續性的增加，這兩三年來整個溝皂的皮革產量甚至可到一個月數十萬張，這麼高產量的廢水與汙泥的處理問題就變得很棘手，部份業者甚至有偷排廢水的情形，天嵩皮革公司老闆 C1 表示：

像我們工廠產量一個月大約才三萬張到四萬張，其他每一家幾乎都八萬張以上到十五萬張，我們產量不到他們一半，但

⁹許清潭政商關係良好，從整個肉豬產業，從屠宰、皮革到飼料都一手包辦，且跟前縣長張榮味關係良好，溝皂居民普遍認為其有黑道背景。

是我們的處理量卻超過他們好幾倍，這是什麼原因啊？因為我們認真處理，他們不處理啊...業界有很多人認為這樣子對他們來講比較划算，下大雨和颱風天對他們是最有利的時候，對我來講卻是最頭痛的時候，每次下大雨的時候，廢水處理量就會增加很多，廢水處理池滿起來就完蛋啦，所以每次颱風天就是我最頭痛的時候，水不處理就只能偷排，對他們來講就埋暗管呀，颱風天最好，可以連雨水一起出去，沒有人會發現呀...確實很多廠商都是利用晚上跟颱風天、下大雨的時候偷排廢水...

(C1, 2010)

雖然工廠產量提高那麼多，但是由於製程機械化和開始引進外勞，所以相對地溝皂居民涉入參與的程度持續下降，真正在皮革工廠工作的居民並不多，而且大多是投資股東的家屬為主，居民普遍涉入程度下降但汙染程度提升的趨勢，使得2007年9月爆發了社區所謂的「民怨」，後來經過里長居中協調，以限期一年的改善來安撫居民，才沒有進一步擴大衝突。但我們慢慢可以看出溝皂的產業結構潛藏一個慢慢升高的矛盾與張力，現今大部分居民的勞動型態為半農半工，多種植大蒜、花生與稻米等大宗作物，但產值不斷擴大的皮革工業，反而卻和居民的經濟生活越來越脫鉤，近來所發生環境與健康的問題更使大家意識到這潛在的矛盾：居民的生活品質與工業資本家的利益究竟孰輕孰重，而持續存在一種詭譎與緊張的氣氛。而且溝皂在十多年前經過了農地重劃¹⁰，已編定為特定農業區，但工業廠區與汙水處理設備便難以符合地目規定，以地目不符與排放未符標準為理由的行政角力因此展開，詳細情形會在後續章節作詳細討論。

¹⁰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理規則》明定特定農業區的土地不可編為工業用途的丁種建地(見表一)。

表一 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表

特 定 專 用 區	河 川 區	風 景 區	山 坡 地 保 育 區	森 林 區	工 業 區	鄉 村 區	一 般 農 業 區	特 定 農 業 區	變 更 使 用 地 編 定 原 則 別
×	×	×	×	×	×	×	×	×	地用築建種甲
×	×	×	×	×	×	+	×	×	地用築建種乙
×	×	+	+	+	×	×	×	×	地用築建種丙
×	×	×	×	×	+	×	×	×	地用築建種丁
+	+	+	+	+	+	+	+	+	地用牧農
+	×	+	+	+	+	×	+	×	地用業林
+	×	+	+	+	×	×	+	×	地用殖養
+	×	×	×	×	×	×	+	×	地用業鹽
+	×	+	+	+	+	×	+	+	地用業礦
+	×	×	×	×	×	×	×	×	地用業窯
+	+	+	+	+	+	+	+	×	地用通交
+	+	+	+	+	+	+	+	+	地用利水
+	×	+	+	+	+	+	+	×	地用憩遊
+	+	+	+	+	+	+	+	+	地用存保蹟古
+	+	+	+	+	+	+	+	+	地用護保態生
+	+	+	+	+	+	+	+	+	地用安保土國
+	×	+	+	×	×	×	+	×	地用墓墳
+	+	+	+	+	+	+	+	+	地用業事的目定特

說明：「+」、「x」為不允許變更編定為該類使用地。

二、「+」為依本規則規定辦理變更編定為該類使用地。

資料來源：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7 條

課程，其實溝皂算是一個大的庄頭，所以 1950 年代開始，溝皂聚落內就設有一個東榮國民小學，從設立學校開始，凡是到適學年齡的學童就會被鼓勵與被要求要入學就讀，不過 1960 年代中期以前，農忙缺課的情形仍非常普遍，尤其女同學更容易有這個情形，當時就有好幾個因此沒拿到國小畢業證書，1968 年，台灣的初中一律改成國民中學，那時候溝皂的學子都要隻身到北港鎮街區的建國國中通勤上下學，有了這種經驗的學子變得比他們前一世代的長輩更敢踏出自己的家園，很多人在國中畢業便直接到台北、高雄等地去當學徒或找工作，變成外出的遊子，若又在外地找到適合的工作或發展機會，就有可能將戶籍遷到現居地而成為外移人口，普遍來說，這些外出的經驗培養了年輕人有自己獨立見解的自信心，但是也會改變了他們所追求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的改變包含目標的追求、處事的態度等：

傳統嘛就是要敬老尊賢..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太注重，是比較糟糕的問題...這跟教育有很大的問題，老師如何定義好學生...會影響學生的價值觀，大部分老師都是功課好就好了..功課不好就是放牛班...就是沒前途，所以無形中把追求名利的價值觀灌輸給小孩子...

(D5, 2010)

水準提高啊，年輕人學識比較好啊...以前都沒甚麼出外...生活比較隨便...年輕人改變很多，因為這個時代...變成要跟得上時代，不像以前舊的，可以用就好了。現在年輕人看東西不順眼的話，他就丟掉了，以前老人家都用到不能用...

(B3, 2010)

第二個方面是資訊科技對鄉村社區的影響，廣播在台灣是日治時代就有的資訊科技¹¹，不過 1960 年代以前收音機的家戶普及率仍低，人們的收聽大多事在

¹¹台灣人第一次聽到廣播是在 1925 年 6 月間的「始政 30 週年紀念」活動會場，1928 年，台灣總督府交通局遞信部開始著手試驗放送；同年稍後，台北放送局(JFAK)成立，往後幾年各地放

公共場合，這樣的機會在鄉村地區相對比較少。而 1962 年台視開播以來，台灣也開始進入了電視時代，但是直到 1967 年溝皂才有第一台電視，那時候也不是馬上每一家都有電視，而是一家一家慢慢地採用這種新型態的資訊管道：

差不多...民國五十六年，這裡才開始有電視，整庄只有一戶人家有電視，喔，晚上如果在看，門口都是人。那是我們一個親戚，他想要嫁女兒給一個當老師的，她女兒也算是大學畢業的...就先買了一台電視來看一陣子，喔，那一陣子好熱鬧喔，然後再當作嫁妝嫁過去...嫁過去之後，慢慢才想說，啊...我們女兒就有一台電視當嫁妝，那我們自己也來買一台來看，接著那一台之後，這裡才慢慢開始有電視。

(B5, 2010)

後來電視慢慢普及之後，也開始對社區出現一些衝擊，年輕一代透過電視新聞知道許多其他地方的事情，並且出外讀書與就業的時間漸漸超過參與農事與社區祭祀的時間，與長輩相處的時間更大幅減少，生活經驗的差距使得年輕人慢慢會開始挑戰長輩的傳統觀念與權威：

有很多年經人就會講什麼我們是老觀念、老觀念的，很多的東西已經不合適了。

(B2, 2010)

有些只有六日回來，回來也都是出去找朋友，都看不到小孩，長輩要跟晚輩說話的機會也很少，因為他出外，回來只有一下子，說不定他也會說你老了沒有用了，現在年輕人會說你這個是老觀念，沒有用了。很多晚輩是這樣回應的，他們會說那是早期...現在沒有在用那些了...

(B3, 2010)

送局也陸續成立：1932 年的台南放送局、1935 年台中放送局、1943 年嘉義放送局、1944 年花蓮放送局。

不過同樣地隨著訊息的普遍，也使得年輕一輩的風險意識提高，開始會注意生活品質、健康與環境污染的議題，例如社區這兩三年發生的基地台電磁波爭議與皮革工廠污染爭議，都是年輕人比較會關心：

說起來年輕人比較會關心環境啦..老人都沒再干涉這些事情，已經習慣了...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擔心子女的身體被影響...知識也一直再增長，他們比較知道甚麼會影響人體啦，去抗議這些皮革工廠的都是些年輕人，我們這輩的就沒有半個...皮革工廠的水滿到田裡面..作物會死掉，可能是有化學物所以會死掉，但是我們就不會想說那個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B3, 2010)

其實中華電信基地台的事是這樣的，本來大家也不知道，老一輩的根本就不知道什麼叫電磁波，電磁波也看不到，不是嗎？就是看到電視說，電磁波會致癌或什麼的，他們才會了解...皮革工廠也是看媒體報導說哪裡被開單或停工，也有影響啦，但主要還是空氣臭味這個是比較明顯的感受...

(D3, 2010)

資訊與交通的改變提供了居民比較的機會，較多外界經驗的青壯居民可能已接受現代性的觀念與生活型態，但上一世代的居民接觸外界的面向與深度較為有限，受到現代性的影響也較小。大約 1990 年以後，陸續有一些青壯年居民返回溝皂定居，不同世代雖然共存於同一場域也持續保持互動，但世代間的觀念差距逐漸被突顯出來，但對於很多處理事情的方式看法不盡相同，只是因為青壯年居民的生活重心仍多放在維持家戶經濟的穩定，所以目前仍以老一輩的意見為主來運作社區事務，但在一些領域(如：國小家長會、公園、自救會...)，青壯年居民也開始展現企圖心與治理的能力，世代交替的現象逐漸在發生。

第三節 社區結構的變遷

前述兩節談到了產業特性的變遷與世代價值觀的改變，這些背景都會影響到溝皂社區結構的變遷，本節更具體地從社區的關係網絡、權力結構、社區意識與社會資本等幾個層面來說明。

首先是社區成員的界定問題，一般來說，老一輩或土生土長的社區居民在概念上會認為只要認同溝皂、對社區有依附感的人就算溝皂的一份子，也會以戶籍或祖先的「根」來作為具體判斷的標準：

戶籍在這邊，就算這裡的人，他即使出外賺錢，還有長輩在這邊...一般如果說比較長輩的，他會說我就哪裡人(來自哪裡)，如果比較年輕的，他會說我是住哪裡(現居地)...一般來說，如果是說認同是我們這邊的人，庄裡的人就都認同他是庄裡的人。

(D2, 2010)

應該出生在這邊跟戶籍在這邊都可以算溝皂人吧，搬遷過來應該算後來加入的，就算房子買在這裡，戶籍也遷過來，他戶籍也是可以隨時遷走呀...而我們在這裡，「根」就在這裡，所以根在哪裡比較重要，戶籍反而比較其次，也是有關係，但是比較其次，祖先在這裡是比較屬於根本的...

(D3, 2010)

但是居住時間較短或是因為婚姻關係、工作關係而遷徙進來的居民們，處於比較模糊的地帶，其認同感就容易受到自身感受到社區的凝聚力與對他們的接納程度的影響，感覺到被排拒或有形無形的隔閡感時就會影響他們參與社區的意願：

我老公並不是在這邊土生土長的...他國中就搬出去了...我們是到民國九十年才搬回來，其實我們很想融入，但是...

(D1, 2010)

還是排斥外地的...他們都說外地來的，都是他們花錢買來的..但我個人感覺是說花不花錢是一回事...娶臺灣的也是要花錢...反正他們的觀念就很不重視我們外籍的，聽了就很不舒服...我婆婆他們沒有直接表現出來，但多多少少都有...說我們都會把錢寄回去啦...我不是認為我是外地人，但我們本來就是從外地來的...是嫁到這邊來...想融入，但是十幾年還不夠...

(D4, 2010)

這個村庄裡面的人真的是排斥外地來的，這很明顯啦，我剛來的時候就被排擠呀，大勝的老闆從水林鄉買下工廠，也遭受很大的反彈...搬來二十年了，還是會把我當成外地人，我兒子在此出生、長大，庄內也把他當外地人...比如說之前在選里長的時候，有一個外地搬來住了大概有三四十年，他要出來選里長，庄裡在這邊土生土長的人竟然說：「里長怎麼可以讓外面來的人做？一定要有我們家族的人呀！」他們有這種觀念...我自從搬來這邊，戶口就遷過來這邊了，在這邊選舉也選了好幾次，老實講，住在這邊就是這邊的人，不應該再去分哪裡來的...

(C1, 2010)

有啦，社區還是有分比較有在管事(公共事務)的人和我們這種比較外圍的人...

(D10, 2010)

整體來說，溝皂的關係網絡有一群比較清晰、大家都普遍認可的核心成員，他們的特性就是家族的血緣與地緣關係緊密結合，這樣的人被預設了有較高的社區意識與認同，但是嚴格來說老一輩與青壯年的情形不應該一概而論，一般來

說，青壯年居民還是常與其長輩放在一起被理解，有點附屬的感覺。而溝皂其他比較處於外圍的人們，可能是因為各種原因搬進來定居或遷徙，這些人較容易感覺到隔閡感與距離感，但也可以透過持續的行動去改變自我與他人的認知。



〈圖四 溝皂內部角頭分佈圖〉資料來源：筆者訪談整理。

另一方面，溝皂的核心成員也不見得十分團結或對目標願景有所共識，村落內部也區分不同的角落或角頭，老一輩的居民會以居住區域來區分彼此(見圖四)，這些角頭形成的時間不一¹²，不同角落與居住區域的利害與意見本來就不一定會相同，例如皮革工廠的污染最嚴重的範圍集中在東邊的龍岩中排與嘉南大圳放水路一帶，對各區的影響不見得相同，當然各角頭就會有不同的立場：

有一句話說溝皂很貼切，就是「放尿參沙袂作夥」(台語)...每個人都想做老大，發表意見，而我們庄本來就有分角頭，不同角頭意見根本不一。

(A1, 2010)

有的在這個區域，有的在那個區域...大家都是跟自己的附近溝通比較好，別的地方溝通比較不好這樣。比較長輩的比較會分你是哪個角頭，現在就比較沒有這種情形了...因為他們這種(工廠)開都開在...像我們十一鄰這一角...那庄內比較西邊的人，比較沒有影響，你跟他講，他就比較沒有意願，就比較不想得罪人...

(D2, 2010)

隨著地方自治選舉的開放後，每年各項選舉累積的恩怨，使得社區有派系分化的情形，再加上原本各角落意見往往不一致，使得公共事務難以推動：

鄉下地方不可能團結的，光看選舉就知道了，以里長或是鎮民代表來說，一個村莊都不超過兩千人了會變三派...因為一些親戚朋友的關係就互挺，如果被說一些不好聽的，還會打架...

(C3, 2010)

選舉分派系，恩怨也會累積，地域廣就分角落，附近的遇到

¹²最早的是竹圍內與下厝(舊聚落)，這兩個角落的北面與西面目前還有幾叢刺竹與林頭樹，當時是基於防風沙與防禦用途而種植的，而五館、山寮、門口圍、新厝與菜園這幾區則是慢慢幾戶幾戶，後來才擴大成居住區的。

事，才比較會互相幫忙...

(D10, 2010)

像皮革工廠這個問題屬於庄的，但庄分好幾派，各派有各派的意見，所以這件事就變成沒人敢處理，而里長又沒魄力，你說要怎麼處理啦！

(D8, 2010)

而且除了居住地域與選舉派系的差異外，工作型態的改變更直接影響了居民互動與參與公共事務的模式，農業機械化與兼職化後，因農業勞動而產生的互動模式也鬆動了，到附近工廠工作而需要配合上下班作息的居民更是只有假日有自己的時間：

上班就是回來很晚了呀，就直接在家裡了呀，很累也不會說想去哪裡走走...有人發動，我們就會配合，因為我們都在上班，不是說整天待在家裡，如果說待在家裡比較有時間，就會有可能說找一些人來整理這個社區，你要找人，你要自己有時間，光叫別人去，哪有可能...

(D12, 2010)

因為溝皂歷史上並沒有顯著的鄉紳望族或是大地主，所以主要是依靠里長來溝通協調社區內紛歧的意見，但成效十分有限：

哪一個當里長都一樣，讓他去當壞人，他不要啦，當里長的人哪一個說當兩屆以後我就不當了，沒有嘛，當到死當到落選為止...大家也都習慣徇私、看關係、重感情啦，你跟我交情好，就什麼事都睜隻眼閉隻眼...還是要有是非的標準，公範圍還是要秉公處理，但在鄉下，坦白說，要講這個很困難啦，因為他有派系嘛...

(C2, 2010)

其實居民普遍對里長和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會等社區領袖出來主持公道這

件事是缺乏信心的，認為里與社區的組織很不健全，而且領袖沒有魄力與擔當：

有人質疑自救會不合法時，D8 不就噲說：「溝南與溝北社區發展協會就合法嗎？還不是人頭和黑箱作業，會議記錄與照片不是都作假嗎？」里幹事說：「有需要攪這麼大嗎？」...

(A1, 2010)

里長沒辦法，因為不想得罪人呀...他們甘願得罪沒錢人，而不願得罪有錢人...里長要展現魄力給大家看呀，像公池的事，里長先徵收呀，大家感覺里長有魄力，他講話大家就會聽呀...但是不可能...

(D8, 2010)

甚至有人認為社區領袖們也主要是爲了各自的私利與打算才擔任該職務，往往為了取得自己個人的好處而犧牲公共利益：

理事長本來是要遴選，里民下去選，但是很奇怪，有照片可以拍，有會議資料可以作，實際上就等於理事長是由里長下去指派...現在里長要綁住這幾個人，所以他把這些理事長的權力放給他們作...依我的解讀，東守要做理事長，主要是想把握住村庄裡的權力...因為理事長可以造成一些人和啦，如果人家在抗議皮革廠怎樣什麼的，他比較有辦法去控制住...如果余東守不當理事長了，換 A1 當，爭取到一些縣政府的建設下來，這樣會使 A1 對村庄裡的影响力愈來愈大，A1 的資源愈來愈多，如果用來對付皮革工廠怎麼辦...但是今天他把這個缺佔住就可以避免這樣的情形發生...勝利師也是，他弟弟在 10 鄰那裡搞一個基地站，他把這個缺佔住了，什麼都配合里長，你想里長怎麼方便把他弟弟的這個基地台拆除？而里長要配合這樣操作的原因...主要是台灣的選舉多，里長的油水自然就多，不只是選舉耶，那皮革工廠要拿多少給他？

(A2, 2010)

以目前溝皂的情形來看，受限於各種條件，成員的社區意識並不是那麼清晰，因此溝皂的社區結構會顯得鬆散與界線模糊，而鄉村社區往往又缺少實質的資源與制度的權力來運作自身，動員網絡內的社會資本來達成集體目標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缺乏清晰的共同目標，使得成員們動用自身資源來投入公共事務的情形很少見。連硬體的建設工作都是等到公部門的補助經費有著落時才會開始進行時，涉及關係與利益衝突的社區爭議事件，像溝皂發生許久的公共池塘侵占、東榮國小與隔壁林旺皮革工廠的校地爭議等事件，都沒有辦法處理完善，只能一拖再拖：

雖然大家選我當里長，但我們又不是鎮公所，所以沒有行政權嘛，也沒有經費...面對這些事，只能找大家盡量協調看看而已...

(A3, 2010)

社區很多問題也不是說無解，其實是社區的組織出了問題，不是小老百姓的問題，這事其實很簡單，里長要做與不做而已，那些池子是公的，那既然是公的，誰會為了這個去得罪別人？又不是我的，我幹嘛要去得罪人去討那塊地方？...介入之後就變成一種結仇，最後冤冤相報...應該是那個在位者要去對付佔有人！那其他百姓只能從旁協助，因為他沒有權力呀！

(C3, 2010)

公共的東西(校地)被拿走了，但縣政府教育局也一副趕快處理掉，不要一直把這個事情拿來縣政府吵...你要對付在鄉下來講算是財團的工廠，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啊，你要花多少自己的時間、你自己的金錢，你自己的資源下去跟他硬拚，但是目的又是公有的財產，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划算？...小孩沒

在學校讀書的居民，幾乎都不會去關心這個事情，你學校的地被人佔走就佔走，廢校就廢校，反正他也沒小孩嘛...

(A2, 2010)

我們可以看到溝皂的社區結構特性：關係網絡不均質、社區意識不明確、權力分散而缺乏整合，使處理社區事務的社會資本難以累積。理論上來說，共同信任的社區規範與穩定的社區結構是相輔相成的，目前溝皂無法處理社區內諸多的公共爭議，確實使居民感覺到社區結構的鬆散與缺乏可信任的規範，筆者於下一章接著探討溝皂規範變遷的情形。



第五章 溝皂規範變遷之探討

本章是建立在前面各章的基礎上去作更深入的討論，分析探討溝皂空間與產業相關規範的變遷情形與背景，第一節先探討規範變遷的背景，第二節規範變遷的趨勢與對社區框架的影響。

第一節 規範變遷的背景

一、社區經濟形態的轉變

溝皂經濟形態的轉變，整體來說是由維生經濟走向商品經濟，並引入現代性的生產關係，而個體為單位的經濟理性也越來越明顯，但是空間與產業行為的轉變並非全面性、斷裂性，而是混雜多元與不均質的，而政府在此一區塊介入的程度越來越明顯，因此規範的重組是必然的結果。

由維生經濟走向商品經濟是一個長期的轉變趨勢，從政府推動計劃經濟的農業生產就已經開始，貨幣成為生產與消費的重要媒介，土地與勞動力也可以透過貨幣來商品化，此時透過市場得到貨幣的多寡就變成衡量經濟損益的指標。北港地區一直是重要的農產集散地，溝皂居民的農產品多透過北港的販子或農會銷往各地來取得經濟收入，1960年代之前，溝皂就已經有居民從事外銷農業與農產加工業，而之後又陸續出現了紡織工廠、皮革工廠等工業組織，溝皂的產業型態表面上是朝向多元發展，事實上經濟理性的邏輯卻慢慢趨同：個體運用各種生產要素與條件去追求自身貨幣的增加。

這樣的模式發展下去，經濟行為彷彿只是個體層次的事，而且社區成員遇上超乎其經驗的經濟發展論述時，對於要發展集體的治理顯得信心不足，態度與行為上比較被動、模糊，經濟發展與社區生活品質該如何在社區裡取得平衡的討論十分缺乏，有的只是片斷的期待與推論：

汙染作好的話...為了生活...來設置這個工廠...也是很恭喜...

可以弄一個工作來生活...甚至這個工廠，使得村內人多少有

工作機會...

(B3, 2010)

皮革工廠主要是因為他們的味道...不然村莊內也有很多人靠皮革工廠在生活的，因為從事農作也沒有賺頭，所以就到皮革工廠上班...他們也有提出...第一，要做一些回饋給村庄，第二點是使用溝皂人作員工，第三是對外聘任專業人員來處理汗水...

(A3, 2010)

有工廠就會有汙染跟廢棄物，這是一定的，家庭也會有呀...然而經濟要進步，一定要有工廠，不然那些農地可以讓你變出多少黃金出來？國家要進步、要強健，也要有國防，如果你不跟國外生意往來，如何去執行國防？工廠就是在賺外匯...傳統產業作這些去賺國外的錢回來，給員工薪資、交稅金，政府才有這些資金去採購這些用品。要有外匯存底才能有國外交易阿！所以工廠一定要賺國外的錢才可以...錢才能增加，國家才能強...

(C3, 2010)

居民多憑印象與自身的理解去詮釋規範，強調個人良心而少談公共的制度，對外部性的思考停留在素樸的同理心：

這算是自己的良心問題啦...自己想出來的...如果良心發現...就會覺得這樣不行...這樣會傷害到別人、妨害到別人，所以就不去做...如果沒良心的，就只會想說反正有賺頭就好了，我才不管你怎樣...

(B3, 2010)

但是這種運作方式只要成員的價值觀產生分歧，各自理解的內容就會產生極大的差異，而且經濟型態的分化使得各自的利益與風險不再適合用共同的標準來度量，就像「風調雨順」已無法涵蓋共同的利益一樣，電磁波、重金屬等外部性

風險也不是人類感官能夠察覺得到的。若資訊與知識並不對稱，根本無從產生規範的共識，而且企業組織及生產流程具一定程度的不透明性，只需符合公部門管理監督的程序，社區其他成員是沒有權利過問與瞭解的，若沒有發生汙染事件的爭議，是很難撼動這一部分的限制，但是一旦空間與產業的議題因為外部性而被公共化，就可能是發展社區治理的契機。

二、 社區成員的差異化

傳統鄉村的社區規範往往就維繫在同質性高的鄉村文化與生產特性上，溝皂過往規範的內容建立在儒家與民俗信仰的價值上，透過家庭教育或是民俗戲劇去傳遞價值，維繫關係網絡內的互惠互諒：

以前的價值教育就是父母還有戲劇...民間的戲劇包括布袋戲，還有那個歌仔戲在教育你因果什麼...會顧慮到其他人，比較不敢作壞...

(D13, 2010)

但是這樣的內容是原則性而非條列性，在社區權威穩固與社會變遷緩慢的時候可以運作順利，但是在一個變遷快速而社區成員開始歧異化時，形成共同的規範並不容易：

就像古人在講，一樣米養百樣人，我們這個庄頭隨便也都有長有短...我們這麼想，別人不一定這麼想，所以每一個人的做法都不一樣...

(D2, 2010)

隨著產業、交通與資訊科技的變遷，使得居民的生活圈與社會網絡隨著就學、工作、消費...等因素慢慢劃分開：

高中就出去念書了呀，讀建教...現在搬回來休養，也是不太瞭解庄裡發生甚麼事...老一輩的不熟，小孩也不熟...比較是過自己的日子

(D7, 2010)

回來後那幾年，我活動的範圍就只到阿珍那家雜貨店，買東西甚麼的都往北港跑...

(A2, 2010)

擁有物質資源與社會關係的差異也逐漸擴大，隨著產業分化，投入工廠經營、從事技術工作與務農的資源差距就顯現出來了，資源差距使得社區的地位體系因此產生劇烈變化，部分從事工商業的社區成員累積資本的速度較快且結交政治人物等，往往會改變其自我的觀感而輕視其他較缺乏資源的居民，也較不願意被集體的規範所拘束而寧可和社區的運作保持一個距離：

他們關係非常好，弄一個工廠在這要好幾千萬...關係不好，能拿到執照嗎？不可能嘛！...他們以前沒有這麼糟糕...錢多了，人的心就大了...他覺得他很有知識，很了不起...心態改變很多啦，以前都是小工廠，這幾年才擴大的...

(D5, 2010)

以我一個企業主來說，能管理一家工廠，就能管理一個社區...但我盡量不碰，參與公共事務很容易得罪人，黨派的關係啊...所以我們要盡量低調，該出錢就出錢，跟每個都好...不要分黨派，選邊站，這樣對自己沒好處...

(C3, 2010)

通常鄉村裡經濟很好的人不搞這個事(公共事務)...出點錢就ok了啊，幹嘛去淌這個渾水還得罪人...也可能事業很忙就不想去管這個...總之，就一般過得比較好的都不喜歡管這些啦，尤其鄉下特別明顯，有的出錢不出力那還算ok的，有的人是真的很冷漠啦...

(C2, 2010)

村落內的居民歧異度增加，要靠共同的社區活動來凝聚社區意識也不容易，

連公共祭祀的參與人數逐年下降，而迎神的陣頭也因為武館的解散而一直面臨找不齊人的窘境，公共祭祀活動在鄉村社會裡以往扮演建立共同感的重要角色¹³，從早期家家戶戶都積極參與到現今只剩少數老年人還堅持著，巡營繞境活動的神轎也從過去用壯丁扛演變到現在是放在卡車載著跑，除了人力不足之外，價值觀的改變也使得祭祀變成一個家戶或個體參與的行為，而集體的儀式就不那麼執著與認真看待了：

人一直少...現在的人顧賺錢，連熱鬧都湊不齊人，不夠人就沒法練...少年不喜歡這個(宋江陣)，練武館比較辛苦，打電腦比較輕鬆...像 A2 這一輩留在庄裡的本來就沒幾個，他們往往也是沒興趣學...之前也有過跟他們說，像跟 A1 說你們晚上揪幾個，我們比較辛苦來教...也是沒辦法呀，說實在的，各人拼各人事業啦...

(A4, 2010)

在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社區成員的差異化，主要表現在世代間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不同、不同產業背景生活網絡的不同，又缺乏集體活動與意見的整合交集，在這種情形下，社區規範不再是高度同質性下不言自明的產物，而是漸漸走入整合差異的溝通結果。

三、 社區結構的轉變

社區的結構鬆散與界線模糊影響了治理的能力，沒有治理的能力又遑論有效的規範，Coleman(1990)認為封閉的社會網絡比較能作到內部的獎懲，而有利於規範的維持，保證信任感與權威的建立與維繫，確保成員對公共資源的持續投資，但是在社會變遷的影響下，以溝皂為架構的社會網絡已不再具有封閉性，大部分家庭均有成員散居台灣各地，家戶的生產與消費關係對社區原有網絡與資源

¹³一般來說，社區的宗教活動可以提供社區成員具在一起的機會，幫助人們融入社區，增加居民對社區與鄰里的依附感且減緩解組，而且信仰本身可以提供對抗偏差行為的規範性資源，促進正向社會互動，最後，宗教組織也提供成員之間的相互幫助與服務(Rose 2000)。

的依賴程度也降低：

實際人沒有那麼多，因為這邊有些人有田地在這邊，所以戶籍會在這邊，但人都出外賺錢，因為在這個鄉下吃不飽...

(D2, 2010)

不是很多人會意識到這個問題，就是人口外遷問題..你看十年又十年的變化..堂哥 A2 大我十二屆，他那時東榮國小有六百多個學生..到我們那年剩兩百多個..現在又過了十幾年..只剩六十幾個...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對社區影響很大卻很難改變...

(D7, 2010)

面對社區結構與成員社會網絡形態的改變，身處核心的成員與社區領袖們卻缺乏行動去建構或強化社區意識，他們滿足於既有的現狀而延遲面對問題。透過居民選舉產生的村里長，除了缺乏實際的行政資源與權力外，也為了怕得罪人而傾向避免介入爭議，即使召開里民大會，實際上居民對公開表達意見顯得十分保留，而且里民大會的結論在缺乏行政手段的情況下往往窒礙難行，這種情形下的社區規範幾乎沒有被公開討論與執行的空間，所以其重要性慢慢地消失。

而且戰後地方選舉的開放，更讓鄉村的治理議題越趨複雜，鄉村緊密的人際網絡動員使得居民選舉參與度居高不下，但是居民投票率高並不代表實際政治的參與程度也高，Hirschman(1970)就認為選舉並非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制度，許多具有選舉權的人民並未善用其權利，他們並不瞭解當前的政策與政治結構，也沒有能力與機會影響政策與監督公部門。在台灣，區域社會的民意代表與地方官員往往挾著民意對公部門施壓，又以資源分配的方式介入各社區的社區議題與掌握社區組織(施威全 1996；湯京平 2002)，成為鄉村治理中掌握實際權力的階層，鄉村治理與其說是依照社區規範或政府法令，不如說是決定於這些權力菁英利益的磋商結果，每次的選舉輪替就是決定誰能擠身權力階層的角力，選舉時的人際衝突與糾紛常因此累積，阻礙社區公共議題的共識凝聚（蔡宏進 1993；蔡明惠

1998)。

地方民意代表與地方官員們掌握鄉村治理的權力，對上可以抗衡公共行政，對下可以干涉社區事務安排，而其行動的考量往往偏向擁有資源的一方，在這種情況下，社區的資源強勢者與政治權力階層結成利益共同體，鬆散的社區幾乎無法證成其治理的主體性與規範的有效性。



第二節 規範變遷的情形

簡單來說，溝皂有關空間與產業的規範，在形式與內容上有三項主要的變遷：一、規範的原則從在地的風俗習慣走向資源管理與現代生產的邏輯；二、國家角色與正式法令的重要性提升；三、規範的形塑方式從「生活習得」變成需要有意識地用大量溝通成本才能建構。

在溝皂，在處理空間與產業的原則越來越理性化，雖然居民還是有一些風水地理、看日子的想法，但是也開始有人表明不相信這些，而人地關係也從農耕勞動的直接接觸，慢慢過渡到透過化學藥物、機具與水泥廠房的隔絕，所以在思考上理性效率的思考計算慢慢增加，而感情的成分慢慢地減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中計算得失的成分也增加，在這種情況下若是缺乏對空間與社會群體認同的社區意識，很容易導致各自追求利益的極大化而不考慮外部性的風險，而其他人都沒有立場與能力約束之。更何況規範內容也需要隨著時代的變遷重新建構與定義，但是社區內部的成員卻因為生活經驗的不同而有歧異的態度與行為模式，此時社區的界線又不再像以前一樣清楚，關係網絡因著交通與資訊的發展而跨越地域，形塑新而有效的規範所需要的社會資本目前仍嫌不足。

當然居民也會感覺到規範的集體性正在減弱，也並不認為會發生約束的效力：

溝皂沒有甚麼公理正義，大家自私自利、沒有凝聚力...推卸責任是溝皂的通病，誰是里長就誰去處理，誰是理事長誰去處理，沒我的事，大家都自私與推卸責任，這就是沒有規範，沒有公理，沒有是非。

(A1, 2010)

公範圍要秉公處理，在鄉下，坦白說很困難啦...

(C2, 2010)

在社區無法有效監督與管理成員對於空間與產業的行為，國家與正式法令的角色就越來越被個體所依賴，Giddens(1985)就認為在民族國家形成以後，基層社會(社區)的各種事務逐漸成為超地方、全民事務的一部分，直接經由行政力量來實現，行政力量的強化包含了社會活動訊息的掌握與人們行為的直接監督兩面向，溝皂的確有這樣的情況，但是我們也可以知道公部門的編制、資訊能力與積極度直接影響其管理能力，因此時常出現無法進行實質有效的管理。在這種情況下，成員進行空間與產業的行為就只是各自遵守法令規定或到公部門跑跑程序之外，沒有甚麼可以約束個別成員要思考可能的外部性風險，一旦產生外部性，有些人可能會用透過對方的親戚朋友去規勸，也有些人會間接或直接要求對方改善或賠償，但是對方若立場強硬而不能接受時，社區成員可以找里長或共同的長輩協調或鄉公所的調解，也可以訴諸曠日廢時且成本高昂的法律途徑，此時若對方有點來歷、關係或勢力，即使某人認為權益受損，也會開始評估惹上麻煩的可能性而選擇是否去爭取自身權益：

溝皂人的心態就是認為你講得通，他就會跟你講，認為你講不得的時候，根本不敢講...

(A2, 2010)

比較單純的比較好講，如果遇到比較複雜的，他們就會比較怕惹事情。以前比較沒有這種公害的，一般都是一些小糾紛，像這種(皮革工廠污染事件)是很嚴重的。大家心裡是很不高興，講還是會加減講，但是不敢很表明地一直講...

(D2, 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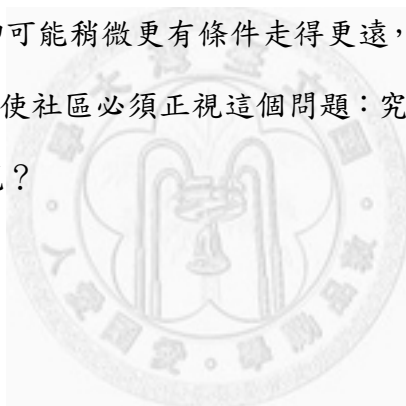
為什麼大家不拿自己的資源下去對付？只剩下幾個人關心，你要對付在鄉下來講算是財團的工廠，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啊！你要花多少自己的時間、你自己的金錢，你自己的資源下去跟他硬拚，但是目的又是公有的財產，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划算？

(A2, 2010)

既然是公的，誰會為了這個去得罪別人？...又不是我的，我
幹嘛要去得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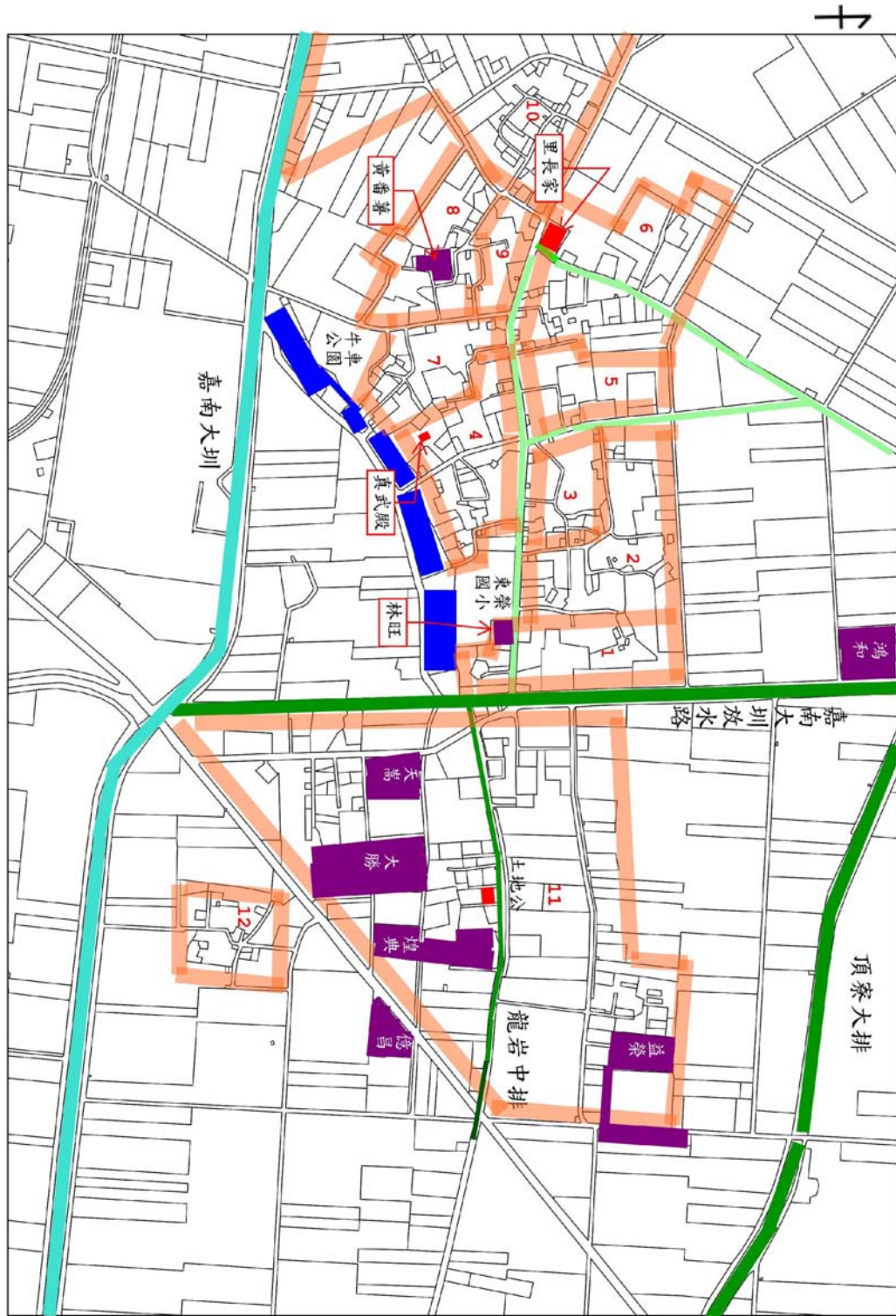
(C3, 2010)

老實說，以上這些作法都偏向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共識凝聚，頂多找一個中介人(里長、長輩、鄉公所、法院等)，但這不是真正的公共治理，即使社區整體共同面臨問題時，目前稍微仍嫌缺乏社區治理與規範約束的機制，如此一來，社區成員容易把公共治理的議題簡化理解成意見、立場不同的爭執，掩蓋住社區規範可以藉此被提出來討論，而且其他成員的關係人性質也沒有被突顯出來，這樣的處理模式在溝皂不斷地出現，公共池塘與校地的使用權與所有權爭議都是如此，但是皮革工廠污染事件卻可能稍微更有條件走得更遠，因為它涉及到經濟利益與健康風險的直接衝突，迫使社區必須正視這個問題：究竟是否應該發展出針對此事件具有效力的社區規範？



第陸章 過程-事件分析：皮革工廠汙染事件

本章運用「過程-事件分析」分析不同行動者的行動、態度與彼此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且說明社區規範究竟在皮革工廠汙染事件中如何發生或不發生作用。



〈圖五 溝皂鄰與工廠分佈圖〉

資料來源：筆者訪談整理。說明：紫色區塊是皮革工廠位址。

第一節 個體行為？：設廠與經營

皮革業者之所以會在溝皂這樣的鄉村設立工廠，基本的條件當然是因為業者財力的限制、環境熟悉度與營運獲利的考量，這幾家皮革工廠選擇離居住區不遠處設廠(見圖五)，在引發其他居民爭議與反彈之前，工廠的遷產行為仍被視為是業者個人經濟行為的決策，而沒有考慮到這也是屬於社區治理的一部分。

現今在社區的這幾家皮革業者在外地透過各種方式取得技術與知識後，選擇在自己熟悉的鄰里或土地上開始小規模營運，逐漸收購附近的農地擴大成廠區，在這過程中，原生社區的社會關係對業者來說是重要的社會資本：

我從民國六十年就在皮革廠當學徒了...人際、人脈關係都在這裡，如果到了外地很多都要重新來過，也是要花費很多時間，那就看你要不要冒這樣的險?...現有的工廠也都是在地人設的...遇到困難，長輩會幫你，去外地的話，人生地不熟，誰幫你？不然為什麼很多傳統產業可以遍布台灣各個村落？工廠家庭化，還有客廳工廠化的提倡...以前當學徒後來回家鄉開業，六十四年的時候有工廠進駐，居民其實都很歡迎，因為有工作可以做...

(C3, 2010)

雖然業者動員原本社區所蘊含的社會資本，卻沒有意識到企業是有所謂的社會責任的，起初營運就沒有把污染防治當成一個重要的項目，除了當時的資訊與風險意識並不夠外，居民對身為同一社區的業者採取包容與信任的態度，因此造成業者缺乏作好污染防治設備的動機：

以我自己是業者來講，這邊的居民是非常包容...把人家稻田甘蔗田都弄得黑黑的，人家也是跟你講一下而已，也不會報環保署，也不會找你麻煩...要是在一般的民風比較強悍的地方，那不得了，給人家汙染到都要賠，結果我去跟他道個歉，

拿個小禮物給他，他也說絕對不跟我收，只說：「沒關係，知道原因就 ok 了」...

(C2, 2010)

業者可以隨時動用社區裡蘊涵的社會資本，而其他居民也未要求業者積極作好污染防治，那以皮革工廠營運獲利的考量來說，這裡真是一個適合工廠落腳的地方。而且溝皂的地價大約一分地¹⁴六十萬左右，而 300 坪的工業區用地就要六百萬，而工廠的規模都大概一、兩千坪以上，在溝皂建廠的話，須投入的成本比設置在相差僅幾公里遠的元長工業區節省將近十倍，可節省的成本差距十分驚人。加上考慮廢棄物處理的成本，每個月又可以省下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元，基於這些原因，設置在鄉村地區的皮革工廠可以有高額的利潤，而政府單位消極管理的態度也會造成不公平的競爭，甚至「劣幣驅除良幣」，規模在溝皂算中型的業者 C1 與業者 C2 都提到這部分：

我們光是用在環境污染設備的場地就必須超過廠房的三倍，我們廠房這邊大概只佔兩百多坪，廢水處理池大概就五百坪，還有那個污泥脫水機跟那個污泥儲存區，也要將近五百坪...老實講啦，不處理環境污染的話是高獲利，如果處理的話真的是薄利呀...我的廢水處理費用一個月將近六十萬阿，其他工廠產量都超過我兩倍、三倍，他們不處理的話，省下的這筆錢非常地可觀...所以這根本是不公平的競爭...

(C1, 2010)

其實台灣最糟糕的就是政府讓違章工廠自己發展，他這個不辦那個不辦，其實也是民意代表要選票在關說...如果大家都是一樣公平競爭，你的成本是十塊錢，我的也是十塊錢，在工業區是十塊錢，在外面也許就是九塊半，所以說...你沒處理就可以發環保財嘛...

¹⁴ 一分地等於 293.4 坪，一坪等於 3.30578 平方公尺。

(C2, 2010)

皮革工廠高額利潤的基礎是對環境的剝削與廉價地使用社區的社會資本，生產行為背後的社區脈絡被掩蓋住，過往僅視其為個體的經濟行為與成果，導致了沒有行動者意識到皮革工廠亦是社區的一部分，積極以社區規範約束並防止皮革工廠營運所帶來的外部性環境成本以及社會資本的透支。



第二節 逐漸浮現的外部性

有很多溝皂居民曾經接觸過這個行業，出售土地、投資、承攬工程、上班等得到一些經濟利益，甚至附近的小雜貨商店或早餐店也會有顧客是來自皮革工廠的，所以皮革業者最常主張的「造福鄉里」就常常指的是這類帶動經濟與工作機會，這也跟對農業前景不看好有直接關係，業者 C3、C1 與其他居民都表達出這樣的看法：

因為這樣(鄉村工業化)也可以帶動社區的繁榮呀...在家就可以賺錢了，不需要跑很遠。如果工廠跟賺錢的機會都集中在大都市，那麼鄉村的地方都沒有工廠，就只能靠農業發展，那不餓死才怪...一分地轉作，政府半年才補貼他四、五千元，但是他去上班可能就有一兩萬元了，如果一甲地半年大概賺四萬，差不多四個月薪水，如果颱風天又來，那等於就沒得賺了，這之間的差距就出來了，所以大部分的農夫都是一半務農、一半上班...

(C3, 2010)

農業遲早會被淘汰，講一個最現實的問題啦，一甲地都在種稻，一年淨利不會超過十萬元，假如你在外面工作，一年怎麼可能只有十萬，一年工資也不只呀...鄉下裡種田的能種一甲地以上的很少數，農業要發展的話應該採用大面積耕作，要不然真的沒辦法競爭啦...小面積耕作還不如去工作...否則的話不用多久，就自動淘汰了啦...

(C1, 2010)

其實剛回來時，我沒上班時有種稻子、花生，也種過大蒜..第一個要翻土、要找人下種、要找人收割...這些工錢跟肥料與農藥錢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加上農作物價格又不好，還要

倒貼...我如果去上班，雖然一個月頂多一萬五、一萬六，至少我每個月看到現金了...如果耕種農作物的話，三四個月才看到錢耶...而且不一定賺...

(D1, 2010)

但是隨著機械化，實際雇用的人工減少，而且低薪資與低技術的工作也的確無法吸引青年人長期投入，有幾間工廠也引進了外勞，這就對業者「造福鄉里」的說法產生一定挑戰，曾在皮革工廠工作的青年也說：

你看這樣像他這樣說造福人群，沒影啦，他們公司裡面溝皂人沒幾個，都他們自己人，只要是在地人去那作的都是股東，剩下都是外地兩三個，其他都是外勞，在地的一個手指頭算得出來...而且現在不是規定薪資要 17,280、要週休二日，他也沒有作到呀...造福人群...先從不違法作起吧...

(D7, 2010)

工廠的擴建亦使業者展示了其優越的經濟實力與能打理公部門、金融機構進而擴大資源基礎的能力：

他們關係非常好，弄一個工廠在這要好幾千萬...關係不好，能拿到執照嗎？不可能嘛！...他們以前沒有這麼糟糕...錢多了，人的心就大了...他覺得他很有知識，很了不起...心態改變很多啦，以前都是小工廠，這幾年才擴大的...

(D5, 2010)

利潤高就可以跟銀行貸款啦...成本一下子就可以回收了，回收後又跟銀行貸款，所以他們擴大很快...以前他可以跟銀行的經理看有什麼利益掛勾，可以超貸很多，還借得出來...

(D2, 2010)

但工廠的生產設備雖然擴大，卻沒有投資在處理廢棄物的設備與防護設備，這就使得居民對業者的心態開始產生質疑，認為業者似乎沒有為其他居民的健康

著想，工廠在賺錢的情況下，為何不試圖降低可能的風險與危害？許多居民因而滋生不滿的情緒：

那工廠開得很大間，然後經濟也不錯，所以大家不敢...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業者)是有一些問題...不想說而已，不想要得罪他...其實如果是為了生活不得已倒沒話講，但是賺錢嘛就...

(B5, 2010)

人是自私的，每個人是自私的，但你不能妨礙別人呀...偷排廢水就是不對呀...

(D7, 2010)

雖然資訊的不完整使得居民無法確認自己究竟是甚麼樣的權益受到影響，除了氣味影響身心感受外，到底身體健康、農作、財產...等受到何種程度的影響並沒有報告與檢驗證據，而且老年人比較缺乏相關的風險意識與蒐證能力且行為模式趨於保守，反過來甚至不希望進行「查證」以免影響到農作物的銷路，這會影響到約束業者的力道：

說起來年輕人比較會關心環境啦..老人都沒再干涉這些事情，已經習慣了...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會...擔心子女的身體被影響...知識也一直再增長，他們比較知道甚麼會影響人體啦...皮革工廠的水滿到田裡面..作物會死掉，可能是有化學物所以會死掉，但是我們就不會想說那個會影響我們的身體...

(B3, 2010)

臭得很厲害，一些年輕人出外回來，有感覺到才出來反應...一些東西全都壞掉，人也受不了，都生病了，住在家裡的人，生病的人好多喔...老一輩的人仍然是忍受耶，如果沒有年輕人來提這個抗議喔，這些老人都會放過他們...也會怕說驗出來，花生賣不出去，但是沒驗出來，讓人家吃出問題，我們明明知道還賣給人家，良心上也過不去...這樣也不好、那樣

也不好...不過這樣下去，在這裡一直吸收這個毒素，菜也吸收這些毒素，即使處理好賣到外面去給人家吃，我們自己也會吃到啊...這些老一輩的人想說偷偷地做、偷偷地收成，偷偷地吃，這樣可以過日子就好了，不要影響到收成就好...

(B5, 2010)

2007年，社區開始出現許多呼吸系統與免疫系統的老少病患，皮革工廠鄰近住家的家具與建築出現嚴重鏽蝕的現象，這樣的風險意識開始在溝皂蔓延，但業者也會辯解說沒有明確的科學證據可以證明工廠造成這些問題的產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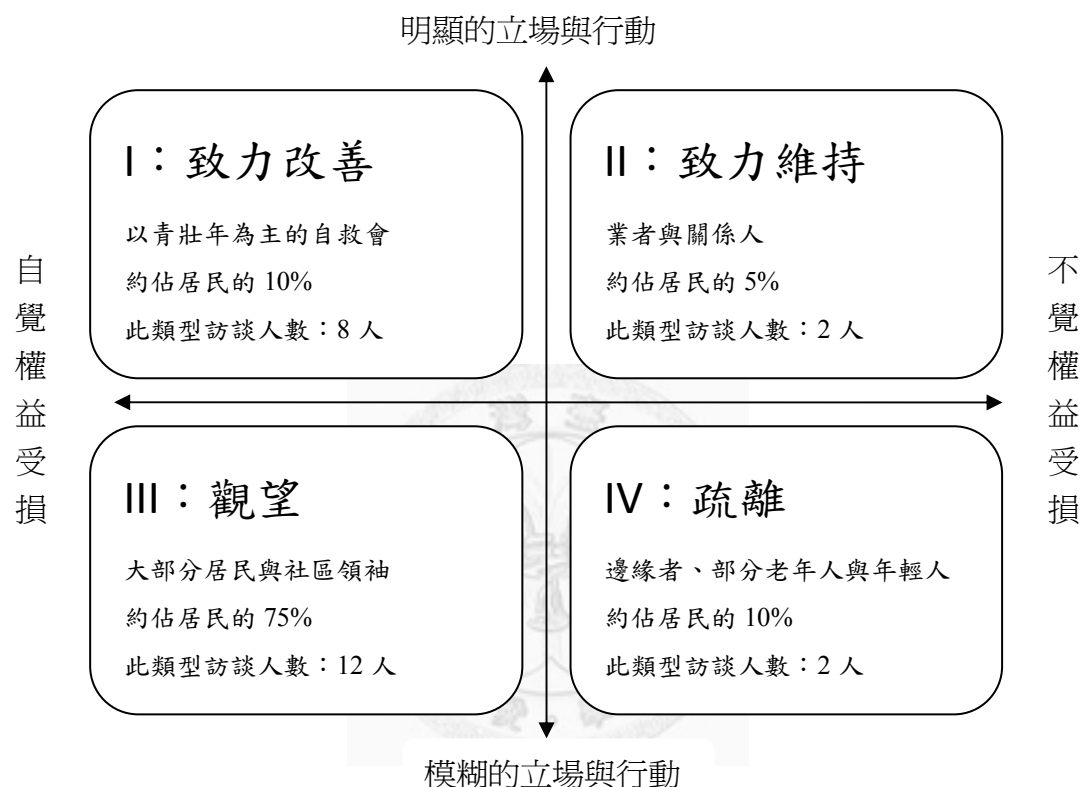
老實講如果有這方面的疑問(農作物汙染)的話，政府應該站出來，讓幾家檢驗機構去檢驗，有汙染就是有汙染，沒有就是沒有，鉻只會影響植物的根部...大家都沒有去把答案弄出來...呼吸道那個是個人體質的問題，不然為什麼只有你家有，別家就沒有?...沿海地區距離海邊很近...從海邊飄過來的濕氣、鹽份高，才會造成金屬、家具容易壞掉...如果是皮革工廠影響的話，我這邊應該是最嚴重的，我住工廠裡面，但是我完全沒有什麼問題，所以要把所有責任都歸咎於皮革廠，我真的認為不合理呀!

(C1, 2010)

直到2009年9月，溝皂三處農地被驗出重金屬鉻超量，被農政單位列為管制場址後更使大家的擔憂得到初步證實：皮革工廠的廢棄物若不經處理後排放是有危害農作、環境與人體健康的高度風險，而社區居民大多知道社區內的皮革工廠並未有足夠的廢棄物處理設施，而且往往未經處理便排放至社區的排水系統，後來台南社大與環保署委託檢測單位也證實了數據確有偏高的情形，大家因此證實了皮革工廠汙染的確不只是居民的臆測而已。

第三節 缺乏社區架構的行動：抱怨、自救會與公部門

居民開始意識到權益受到侵害，認為業者違反成員間的互惠規範，但是對於採取行動的意向與態度是不太相同的，筆者依據皮革工廠汙染事件中改善環境與付諸行動的態度，將成年的居民區分成四種類型以用於後續的分析：



分類 III 的居民會認為自己受到皮革工廠的影響而權益受到侵害，但不願冒風險公開行動去改變這些工廠經營模式，所以居民發展出一種模式就是「道德論述的抱怨」，這是居民很重要的心理自我調適策略，主觀上有希望它有用，但是這種道德論述並不會真正公共化，往往是建立在私人網絡的言談，偶爾穿插著對其違法事項的人格否定與對超自然力量給予公平懲罰的期望而已，抱怨的內容除了排放廢水與惡臭的抱怨外，融資倒閉而沒有遭法拍的信用汙點、業者家屬非自然的死亡事件以及子女敗家等話題，都舒緩了居民普遍壓抑久的心理壓力：

皮革工廠好臭..臭到受不了了，我們家剛好在皮革工廠旁邊...

我們沒辦法生存...他們又沒有辦法買下來，讓我們搬出去...

家裡的電器常常壞...我有時半夜都臭醒耶，我看電視上有些工廠都蓋在比較遠的地方...這裡皮革工廠卻在住家...別人家的生活空間...

(D4, 2010)

蔡清和的大哥說話很自大，他一開始去皮革工廠作業務，捲款逃跑，才開始買這些設備...八十七年、八十八年吧，蔡清水、蔡清和跟我也不錯，當時我在蓋鐵工廠時，他問我怎麼不起大片一點，我跟他說沒錢呀，他說：「沒錢去銀行拿就好了呀，這我專科的，我教你」，但是我回他：「我知道你專科的呀，但是你做得到，我作不到」...他跟銀行經理打好關係，然後超貸後脫產嘛...都是以空賣空，五鬼搬運，把責任撇清...當時老闆是他二哥蔡清水，後來破產法拍歇業一陣子，換蔡清和回來，原本叫昌陽，後來換鴻和，也法拍過一次...

(A1, 2010)

其實那個地方很邪門...一開始是他(余東守)小舅子突然無緣無故就死掉了...然後再來是他太太，還有兩個外勞，然後再來就是一個女生外勞，來照顧他孫子的那個，就在東邊那邊的墳墓死掉，然後沒多久又有一個外勞開推高機被壓死...去年的三月初三，那天晚上余東守就在真武殿拜拜，跌一大跤那時候他就已經覺得毛毛的了，然後隔天三月初四一大早，他的外勞就...可能是半夜推高機轉彎不慎，就壓死在那邊了，當時沒人發現，到早上才被發現...他最近這幾年像是初一十五都會在那裏拜拜燒香...

(A1, 2010)

布袋戲還有那個歌仔戲...就是教你有因果什麼...所以我們都會不敢做壞，然後也對壞事感覺就很可恥的...「為自己」就

是惡，從他的行事標準，就會知道他的心到哪裡，其中有幾項是為自己想...為了自己的利益，它這個就是惡...因果到的時候，不可能你不相信...到最後，包括他、他的後代會怎麼樣...

(D13, 2010)

面對社區裡這些流言蜚語，業者也會感受到一定的壓力，但是壓力還沒大到可以改變他們的經營模式，業者會以自己的角度辯解，甚至強調對神明與信仰的貢獻：

大部分都是看你好就眼紅，想把你拉下來呀...個人會有個人的想法，思想跟言論是自由的，但攻擊他人要提出證據呀...要有證據才能這樣去公開。所以這是有心人士想去擴大一種對工廠不利的事...為了要反對你，所以一直製造很多方式來打擊你，謠言是一種，上網攻擊你也是一種，那行政單位如果不明就理，就會來找你麻煩...其實我們是受害者，他所提出的訴求跟問題，其實我們沒有，我們做得很好，你為什麼還要找我們麻煩？企業才是(社區與公廟)大筆贊助金的來源。老百姓肯定是只有幾千元...如果有過去那個小廟，我們鴻仁就是有捐贈那個燒香的，金爐和廟埕是我捐的...還有學校啊！還有社區的設備啊！監視器也是花了好幾十萬的，到處設來改善治安，這就是社區工廠化、工廠社區化的結果，回饋地方，也可以讓地方有工作機會，相輔相成。

(C3, 2010)

真的是很冤枉！因為上游的水跟我們同一條溝渠在排嘛，我們處理過的從這邊流下去跟從上面流下來的在這裡匯流呀，結果在這邊看到有顏色或有味道都說是我們這一家...環保局也有這種傾向，人家檢舉說我這邊在偷漏水，來採水的時候，

我根本已經下班都沒在做了...老實講啦，這次的事件是同業發起的啦，要把這家外地來的幹掉，同業教導居民怎麼樣去對付這些皮革工廠啦，一開始是這樣子，他們發起這件事情，又提供資金與這個皮革廠的弱點給居民，然後要居民起來搞這件事情，我們根本是被掃到颱風尾...不過，那些經營者的心態也真的很要不得，今天老實講，如果上游這兩家有老實去處理的話，這件事情不會演變到這麼嚴重，即使居民對外地來的再怎麼排斥拉，也不至於造成這麼嚴重的...

(C1, 2010)

即使業者真的對廟宇的祭祀活動與社區有所捐獻，但部分居民仍不會因此產生認同，反而認為是在分化社區或模糊焦點：

說好聽是回饋...不好聽就是在賄賂神明...我去廟裡看刻在牆上那些，常看到這個誰倒人家多少錢，這個誰睡人家老婆...都是想賄賂神明，那沒有用啦...

(D13, 2010)

像隔壁番溝里有一家燦美，本來那邊居民也是很反彈，後來翁水上議員有給里長壓力，那燦美也捐了一筆錢給他們廟裡，就沒甚麼聲音了，我擔心的就是這樣...原本他們的親戚朋友沒有立場幫他們說話，拿了回饋之後就不一樣了...清和曾經跟我說：「村裡的事我也很熱心呀，你看武館、學校我都有參與，皮革不能作，欠人一身債，一定要跑路，你忍心看溝皂失去這樣一個對溝皂有建設的人嗎？」那我笑一笑：「喔，這樣喔」...我們不用你那麼犧牲，只要你不污染我們就好了...

(A1, 2010)

不論反對皮革業的居民或是業者本身，各自所持道德論述的重點原則是具有

共通性的：(1)是否盡好自己的本分與為他人著想；(2)對社區是否有貢獻；(3)是否遵守一般社會價值的規範，如：法律、信用...等等，雖然有這些共同原則，但是由於資訊與立場的不一致性，加上權力資源又不均等，而且非常缺乏一個大家都信任的平台或機制，所以大家無法用一個比較公開的方式去處理各自立場不同的爭議事件，很多人只能寄望這些私下的抱怨、詛咒和超自然的因果報應，稍微調適一下心理的不滿。

雖然溝皂曾於 2007 年 9 月召開里民大會，當時各工廠均派代表到場協商並承諾將在 2008 年 9 月前改善，但是最終卻不了了之，因此促成了社區環保自救會的產生，自救會的積極分子以受影響最嚴重的十一鄰居民為主，其他鄰的參與就比較屬於少數幾個的情況。自救會的靈魂人物是 A1 與 A2，兩人都是出外工作後於十餘年前返鄉的青壯年，A1 一面從事鐵工維生，一面在自家附近也從事小規模農耕與畜牧，而 A2 則是從事工程行作為職業，承包工程並聘請師傅完成客戶的工作，因為 A1 與 A2 兩人先後擔任過東榮國小家長會長，沒當會長的時候也是家長委員，因此長時間的合作培養了深厚的情誼，並且因此和社區裡面子女相似年齡的家長都培養一定程度的信任感，並培養公眾參與的經驗，而 A1 對社區民俗與治理有強烈的興趣與認同感，參與武館、公廟募捐甚至曾擔任真武殿的管理委員，並且在 2008 年也選上北港鎮農會的代表，A2 一家則是對教育非常熱心，加上經濟狀況較佳，所以常贊助東榮國小的活動與文具耗材，也曾積極投入學校與隔壁工廠的土地糾紛，以求教育環境的改善，這兩個人在社區年青一輩中是蠻被看重的人物，也蠻有號召力的，所以在組成自救會時，這是一個很大的助力，很多人看到他們之前熱心投入各種社區事務，比較願意相信他們而參與自救會的活動。

A1 與 A2 為甚麼站出來的原因主要有兩點：第一，A1 從事鐵工與 A2 從事工程，兩人都曾接過皮革工廠建設的工作，在工作的過程中有辦法對生產過程作第一線的觀察與對業者的經營手法有深刻的瞭解；第二，兩人都住在污染最直接的 11 鄰，僅離工廠區大約五十公尺左右，2008 年，A1 的女兒罹患不明原因的

免疫系統疾病，曾病至垂危，A2 的哥哥、嫂嫂、姪子等都出現呼吸道與心臟疾病的惡化，雖然這些疾病都未能直接證明是皮革工廠污染所造成的，但是卻是使他們下定決心在 2009 年 7 月開始組成自救會的重要原因，而因為這個議題普遍受到居民的共鳴，所以聲援要求改善的人，甚至有些工廠員工與員工親戚也都對自救會早期的訴求持正面態度，而關心有機農業的自然科老師、血氣方剛的年輕居民、土地被管制的農民與一些想改善污染現況的居民更積極參與自救會的規劃與運作。

自救會為了促使社區內的皮革工廠改善其廢棄物的處理，進行如調查紀錄、社區教育、向公部門陳情與媒體曝光...等各項工作，但是一開始自救會組織的運作還是較鬆散、略具雛形的狀態，後來外界開始注意這起污染事件的發展，學生、環保團體與台南社大...等開始介入關心，這時候自救會開始走向組織化，有定期的開會時間、工作計劃與公開的活動，但是這也等於慢慢劃出自救會與一般社區成員隱然的界線，自救會和社區的關係變成一個弔詭的問題：自救會表現出想說服社區其他成員意識到問題並採取行動的姿態；而社區其他成員則是在觀望自救會的各種動作會對他們個人有何種好處還是壞處，再選擇自己背後暗助或是牽制的立場。

其實皮革工廠這種「高耗水，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是目前政府沒有意願扶植的產業，但政府未清楚提出輔導轉型的計劃與協助，所以它們就持續就地進行其生產，業者與居民的利益看起來像「零和遊戲」，但其實社區內部對於改善的達成方式是有不同看法存在的。有些人認為皮革工廠絕對不可能改善，皮革工廠與社區不可能共存，所以目標是趕走皮革工廠，但也蠻多人認為皮革工廠是社區的一部分，只是現在沒處理好污染排放的問題，等工廠確實妥善處理就不算是甚麼大不了的問題。社區成員對「皮革工廠與溝皂的關係」的看法不相同，對於發展社區規範約束空間利用與生產行為的看法也並不相同，太過強化零和遊戲的立場其實無法得到大多數居民的支持，大家反倒寧可期待明知效果有限的協商、再協商。

自救會一開始訴諸媒體曝光時，強調皮革工廠汙染對社區居民健康與農產生計的影響，但是隨著農政單位只負責將部分土地管制、銷毀其農作後，地主卻必須自己透過法律途徑或是公害糾紛協調進行損害賠償時，許多居民開始卻步，認為可能會血本無歸而開始對自救會施壓。在意識到社區目前缺乏處理爭議事件的具體機制，社區意見分歧且願意積極付諸行動的人數又過少時，有請公部門的縣政府來充當出頭的「代理人」就變成一個共同的選擇：

因為他們是開工廠的，村裡的人太少，不夠力，一定要比較高的才能壓下來，不然一般百姓他們才不管你...

(D6, 2010)

你講他，就擋到他的財路，他一定比較不高興的...我們算是人多，我們不是直接找他，我們從上面、從政府、從縣長下來，他比較沒有辦法說什麼...上面命令下來，我們跟他比較沒有直接的關係，算是比較間接的關係...

(D2, 2010)

但是自救會對公部門的訴求，強烈要求農政、環保、地政與建設單位能採取一個有完整配套的解決方式來處理這起汙染事件，但是這樣的模式始終沒有出現，致使自救會急於在 2009 年底縣市長選舉前有所動作，讓現任縣長因為選舉考量而加速處理速度，但是剛好十一月是溝皂大蒜的收成期，自救會所策劃的公開動作使溝皂內為數眾多的蒜農非常緊張，擔心收成後銷不出去，而縣長蘇治芬也透過幕僚表達不希望選前生事的要求，在這兩方面的雙重壓力下，自救會內部產生很大的意見分歧，有一些幹部與外援本於對公部門的不信任，認為只有持續曝光施壓才能達到改善，但以 A1 與 A2 為首的一部分幹部，則持比較保守的態度，不願意冒著社區大多數人與公部門撕破臉的風險貿然進行公開陳情，這雙方的考量都有其道理，但是立場一劃開後，彼此的情緒投射一發不可收拾，為此自救會內部嚴重分裂，徹底失去後續行動的活動力，而溝皂居民自此就從抱怨皮革工廠延燒到抱怨其他社區成員。

其實，即使是自救會偏穩健作法的幹部也認為政治人物主要是「選舉考量」，而公務人員常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公務員心態」，所以都不太值得信任，而中央官員天高地遠，最多只能作為牽制縣政府的一種壓力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早先的媒體曝光策略背後的預設就是希望「中央政府給地方政府壓力，而地方首長因為選舉考量再將壓力給公務員，這樣事情就可以處理了」，會採取這樣的策略就表示社區居民普遍對政治人物與公務人員缺乏信心，但是在後續的發展中，自救會已經嚴重分裂，其他居民也僅止於觀望事態發展，大家就只能抱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等待公部門處理的作為了：

民眾的聲音大了，電視台報了，他擋不住了啊...所以公務人員就是怕吵啊，你吵了他就有壓力要去處理...

(C2, 2010)

當時縣府說要介入時，雖然環保局蠻積極的，但行政過程難免有些往返的時間，我也在擔心縣府用行政往返這個理由來騙我們...縣府也有要求給他們時間處理，庄裡大家是擔心被騙，我夾在中間，實在說也很擔心縣府敷衍了事，但是沒得選擇，我們抗爭就是為了要縣府處理，今天縣府已答應要處理，若執意抗爭，會不會惹惱縣府？但我也對縣府不信任，怕這個承諾是為了選舉，選舉完就不管我們了...但我們沒得選，只能選擇相信...

(A1, 2010)

公部門的確發揮的一些作用，幾次稽查後，雲林縣政府環保局與建設處以污染與地目不符等理由，要求溝皂的四家皮革工廠在改善前勒令停工，這使得這起爭議事件的戰場表面上脫離了「社區」的層次，而變成行政程序的攻防，但是這其中的弔詭是縣政府採取一種保留所有可能性的處置，讓居民與皮革業者都存有期待卻又懷著不安的心情。雖然皮革業者雖然不喜歡公部門的強勢介入，但是他們也會希望一旦公部門出面背書其合法性，他們就可以突破居民的心防，順利化

解居民的反彈聲浪：

之前要把我這家停工的時候，我就質疑稽查人員的專業不夠，結果罰款罰更重，標準是同樣的，別家被罰四十萬，我就被罰了九十萬，未來不讓我復工的話，這行政訴訟是肯定非打不可的呀...這是最後一招了，因為打行政訴訟的話就可能要跟政府對立嘛...那他根本不可能讓我復工阿，目前要申請復工的過程當中，這行政訴訟不可以打...老實講，如果說什麼都合法的話，空氣符合標準、水符合標準、地目符合標準，統統符合標準，里民有什麼條件不讓我廠商做...里民不可以再有那種不讓廠商做的心態...

(C1, 2010)

而公部門雖然被大家期待來處理這件爭議，但是中央政府沒有產業的整體規劃，而縣級政府只能一方面要求皮革業者補件完成行政手續，一方面又對居民進行安撫，這樣的兩面手法更加深雙方的不安全感：

政府的事情管理好，居民根本也不用抗爭，民眾也都看得清清楚楚...政府的工業區不給工廠進去...申請環評也不會過...如果政府負責任就像大陸、越南一樣，到一個地方去集中管理，對產業、對居民都很好啦...是因為根本沒地方搬啦，所以這個問題才會卡這麼久...這個行業高污染、用水量又多，政府不喜歡這個行業...不喜歡又不敢講也沒有配套...我們前兩年開了一個會，就是要把這個全部集中在善化的台糖土地呀，政府什麼都不補助啊，土地也不釋放，都要業者自己去承擔，結果幾十億還是幾百億的基金，業者都已經認股認了百分之六七十了喔，最後什麼都不同意...

(C2, 2010)

最近我們這個事件爆發以後，曾經詢問過縣政府那邊，就算

在工業區裡面也不准你再設...因為我們工廠並不是百分之百合法，我們的防治污染設備幾乎是建在農地上，環保局這邊給我們一個很大的難題就是要我們把農地變更為丁種建地以後，才准我們申請復工啊...去年八月環保局把我們停工，開始辦理這些地目變更...到現在已經將近九個月呀，還沒有通過...一般來說，廠商提出這個要求後，你認為廠商條件夠不夠？夠就應該同意嘛！不夠的話是差在哪裡？要講啊！你不可以放著一直再拖下去啊...光是利息就可以把我們摧毀...

(C1, 2010)

然而在這個暗潮洶湧的時刻，縣府也不願有明確的態度，反而強調會尊重社區共識來處理皮革工廠復工與否的問題，無論事情是否如縣府的「美意」發展，我們可以從此看出縣政府這個「代理人」也有其限制，無法發揮出社區原本預期其徹底解決社區爭議的作用，這是當然的，在兩造雙方立場接近零和時，縣政府也不想貿然得罪任何一方。就地合法的「既成事實」是工廠得以生存或復工最重要的籌碼，況且如果地方政府公務人員的心態是避免麻煩，所以居民認為皮革業者只要透過施壓來減少社區居民對公部門的投訴與檢舉，公務員就會傾向核准復工，而且業者亦可以透過政商關係對公務人員施加壓力，讓復工的速度加快，而皮革工廠在溝皂的存在事實也將往「合法化」與「正當化」的方向去推進：

我們百姓沒辦法處理這種事情。他會對百姓施壓力，對上面是用政治的手段，對百姓是用比較不理性的手段，也是會對我們有壓力...

(D2, 2010)

其實他(居民)怕事是正常的心態，會有壓力啦，怕人家來關切啊...你要說沒有黑道嗎？有啊，有壓力是當然的啊，我們不能說那又沒發生，發生的話就不是恐嚇了，他即使針對頭頭，其他人也是會怕...應該是有這個寒蟬效應吧，因為太瞭解了

嘛，當然不瞭解的就不緊張啊，其實哪一個人在做什麼事情，哪一個在出頭的，大家都知道嘛，他當然會有壓力啊...

(C2, 2010)

其實檢舉人的名字...應該要保密...好多人不願意檢舉，就是環保局那邊沒做好，常跟工廠說：「誰誰誰來檢舉你，所以我來看一下。」...結果檢舉的人馬上就有人來關切...我曾經因為這樣跟環保局發飆...蔡清水也曾公開說：「誰在作怪，打斷腿後，看還會不會跳。」...大家怕皮革工廠報復，我二月初也有找大家提損害賠償，但是沒有人出來，我如果自己去，只有自救會長去提，即使拿到，也會被大家閒言閒語...手續費本來要先繳 3,000 元，個別的求償金額不一定划算，所以後來我找大家簽委託書，集體委託我處理，但大家不敢簽，怕被報復，後來清明前後，又有黃代表威脅要拆庄裡違建，大家又更怕了...

(A1, 2010)

在此同時，社區居民也積極強調縣長允諾社區「擁有同意權」這件事意圖牽制復工：

復工不是要尊重我們村庄的同意嗎？聽說縣長說要村庄的人同意讓他復工，才能復工呀...

(D12, 2010)

但是筆者仔細深思一下，各種同意方式在目前看來都缺乏具體操作的可能性，例如：大家簽名蓋章同意、召開里民大會表決通過、公害糾紛調解成立...等方法都只是一種形式，若大家無法真誠地溝通討論，未必可以形成大家可以接受的共識方案，「社區失去共同的規範」實屬這裡面最關鍵的問題，沒有判斷的依歸就沒有辦法進行實質討論，大家都在同一個社區內生活，面對攸關龐大利益的紛爭，行動者擔心在過程中被掌握立場且身分曝光，此時大家的意見都會趨於不

表態與模擬兩可。若社區沒有辦法進行價值觀的整合，並齊心協力落實在具體事務的治理上，代理人的介入不見得可以徹底解決問題，只是將問題延後而已。



第四節 事件過程中的關係變化

既然既有的機制與社區規範無法達到空間利用與產業發展的共識，外部性的爭議事件爆發後，即使覺得自己的權益受損時，考量到出頭的風險與效益的比例，個體採取行動的誘因不高，往往傾向選擇觀望來避免麻煩：

為什麼大家不拿自己的資源下去對付？只剩下幾個人關心，你要對付在鄉下來講算是財團的工廠，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啊！你要花多少自己的時間、你自己的金錢，你自己的資源下去跟他硬拚，但是目的又是公有的財產，是不是值得、是不是划算？

(A2, 2010)

既然是公的，誰會為了這個去得罪別人？...又不是我的，我幹嘛要去得罪人...

(C3, 2010)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有一些問題...不想說而已，不想要得罪他...老一輩的人也就這樣忍耐，比較保守，比較不喜歡出事情啦...

(D2, 2010)

一般居民抱持「搭便車心態」，希望有人能帶頭解決事端，而自己可以盡量置身事外，而且社區的關係網絡糾結且複雜，不論親疏遠近總能牽扯上一些關係，所以「顧念關係與情分」就變成居民不行動與搭便車的一個好藉口：

就得過且過啦，鄉下人就是很重情，所以才會一間一間地開...

(D12, 2010)

單純的比較好講，如果遇到比較複雜的，大家就會比較怕惹事情，以前比較沒有這種公害的，一般都是一些小糾紛，像這種(皮革工廠污染事件)是很嚴重的。

(D2, 2010)

現在很多人講人家閒話，但真正遇到事情卻不管！...以溝皂來說，說的人比較多，作的人比較少...

(D5, 2010)

大家也都習慣徇私、看關係、重感情啦，你跟我交情好，就什麼事都睜隻眼閉隻眼...還是要有是非的標準，公範圍還是要秉公處理，但在鄉下，坦白說，要講這個很困難啦...

(C2, 2010)

社區越瀰漫這樣的氛圍，較積極投入改善的自救會成員越容易感到不滿與灰心：

沒有公理正義、自私自利、沒有凝聚力...推卸責任是溝皂的通病，誰是里長就誰去處理，誰是理事長誰去處理，沒我的事，大家都自私與推卸責任，這就是沒有規範，沒有公理，沒有是非。

(A1, 2010)

沒有參與的人都沒怎樣，沒站出來都沒怎樣，站出來的都被說成怎樣怎樣...溝皂人的心態就是認為你講得通，他就會跟你講，認為你講不得的時候，根本不敢講...

(A2, 2010)

侵害公共權益的強勢者也會透過人際網絡與關係的張力來達到壓抑反對聲音的效果，整體來說，溝皂的這種現象造成一種社會資本的損耗與透支，抑制了社區的信任感，「社區」性質因此轉變，從一個具有高度認同且關係互動頻繁的社會單位過渡到一個居住區域而已，居民彼此之間的信任感降低，連互相幫忙與打招呼的情形都越來越少了，導致社會互動的減少與付出意願的降低：

大家心裡是很不高興，講還是會加減講，但是不敢很表明地一直講...比較不會(聊天)了啦，大家心裡有數啦！他也不知道怎

麼了、我們也知道怎麼了，大家就盡量不互打招呼...

(D2, 2010)

好像大家的凝聚力越來越不見了...你覺得還有需要再參與(公共事務)嗎？

(D1, 2010)

其實我想了很多，本來為了這個社區，我也不想放棄，但我實在很失望，我不再理會這些事情...我感到疲於奔命啦，我投入太多精神時間在社區，我的工作都爛透了，使我很深刻地地在想這件事情，值不值得...

(A2, 2010)

社區公共爭議的處理呈現膠著，而令人不滿的情形持續了好一陣子，成員們深刻地知道彼此(包含社區權威在內的居民)的心態是將個人得失的計算放在社區整體利益之前，沒有願意為公益犧牲奉獻的人物：

很少了！從以前到現在，個人的利益都一直...人本來就是自私的，要能為公眾的，我看是很少、很少。

(D2, 2010)

哪一個當里長都一樣，讓他去當壞人，他不要啦，當里長的人哪一個說當兩屆以後我就不當了，沒有嘛，當到死當到落選為止...

(C2, 2010)

Wulfhorst 等(2001)就指出社區意識往往建立在成員對集體的承諾上，而且領導者的特質與表現，也會影響居民的社區依附感(O'Brien 和 Hassinger 1992)，這些面向在溝壑都不令居民所滿意，而且整體環境品質的下降與社會關係的鬆動也會使社區依附感也越來越淡薄。社區依附感降低的話，成員可能較傾向搬遷離開社區(Beggs et al. 1996; Connerly and Marans 1985; Lee et al. 1994; 廖培珊 2004)，就會造成原有社會關係的減弱或斷裂，更進一步降低社會資本。眼看社區規範難

以恢復其有效性，生活品質有可能繼續惡化的情況下，有些青壯居民陸續開始考慮搬遷的問題：

包括牛車公園、自救會這些事情，他(A2)很灰心，等小孩今年國小畢業就要搬走，但是因為你之前有參與，就有一些無形的責任，現在抽腿會留話給別人說...

(A1, 2010)

A2 考慮要搬去北港，我是可能搬到草湖...之前就一直叫我爸搬走，我爸捨不得這裡的田地，這是他一手跟我媽兩個打拚起來的，放不下手...還是不願意搬走啊，但是如果又再臭的話，我會搬走，不能傷害到小孩子身體...

(D13, 2010)

整體來說，缺乏有效的規範使居民間產生不信任感，缺乏整合機制的情況下，意見的不同往往導致了關係的惡化，社區意識與社會資本也有衰退的情形，但是反過來說，也刺激了所有成員共同思考既有治理機制的不足，就只差溝皂的居民是否願意付諸行動從溝通歧異與形塑空間與產業的規範開始，培養社區治理的經驗與信心，進一步朝向永續社區發展的方面邁進。

第五節 小結

從皮革工廠一開始設廠到爭議的膠著，我們可以看到社區規範在處理這件事上的無力其實是由很多主客觀的因素所共同構成，而社區裡的行動者也因為其利益、權力位置、風險認知、關係網絡與所處生命階段等而有不同的態度，不同的行動者也用不同的角度去詮釋這件事的發展，但是缺乏有共識的社區規範卻使得社區沒有辦法自行處理這起爭議事件，而社區居民大多傾向不承擔風險、投注時間與精力去由根本解決問題，反而傾向採取抱怨或由公部門介入處理的策略。其實社區內部經由爭執、嘗試錯誤而慢慢成長的歷程很重要，達到相互理解與形成新社區規範共識的機會實在很需要被開拓，溝皂社區環保自救會就是一次失敗的嚐試，雖然失敗了但卻充滿意義，讓我們看到重新建構社區框架的困難與必要性。現在看來較困難艱辛的路，也許正是根本解決問題並發展願景的康莊大道，所以如何透過社區框架來解決污染事件與培養公共治理的經驗與信心極可能是社區永續發展的希望所在。



第柒章 結論

第一節 結果與討論

筆者透過溝皂的社區個案研究，發現由於經濟的理性化與個人化，使得居民在處理空間與產業上採取個體自我判斷的方式，在外部性的防治方面除了援引法令外，社區規範與群體壓力的力量是孱弱的，而歧異的態度與生活模式也使得社區成員須要投入大量溝通成本才能使社區規範被有效建構，目前社區的框架由明確的地理疆界轉化成同心圓式的關係網絡時，但是缺乏明確的社區目標與規範，使得溝皂的社區意識與社會資本難以累積，社區的結構也就相對鬆散。

缺乏空間與產業規範的社區、缺乏規劃的公部門與企業體質的不完善共同導致皮革工廠污染事件的發生，污染問題發生後的處理也因為前述條件的缺乏而陷入泥淖，以下我們分成兩個部份來討論，第一個部份是鄉村工業化對社區遺留下來待解決的課題，第二個部份是溝皂的社區規範究竟有哪些困難與契機。

鄉村工業化是政府在現代化發展論述的指導下所大力推動的政策，直至今日也還是如此，除了設立各種產業的鄉村工業區外，也輔導許多中小企業在鄉村地區建立生產基地，雖然的確有增加居民收入來源的效果，但在鄉村居民眼中，作為職業來說，還是無法跟都市的就業機會與條件相提並論，而且這些工廠之所以設立在鄉村，多半是基於成本的考量，先天的資本額不足而後天又缺乏公部門制度性的支持與挹注，所以企業組織的健全度與社會責任的概念都比較缺乏，所以容易產生環境污染的問題，在環境與生活品質意識日漸提高的今日，工廠與週邊居民的矛盾與緊張是不會消失的。在意生活品質或健康風險的居民外移動機會增強，但這些人往往是鄉村中教育程度較高、掌握更多資訊或政經條件較突出的人，若他們向外遷險或不再認同社區的框架，將對社區的永續發展產生很大的困擾。就溝皂的經驗來看，缺乏規劃與規範的工業化反而會使鄉村出現經濟衰退、生活品質下降與人口外移的現象，將既有的鄉村工廠視為社區的一部分，相關的行動者透過付諸行動，重新建構出符合各方利益的社區規範，才能使社區信任感

不致因為這些衍生的矛盾與衝突蕩然無存。

在社區發展的層次來看，固然很多學者認為擁有豐沛社會資本的社區，經濟發展的表現較佳(Woolcock 1998)，但是加入對其所處社會背景的觀察，卻可能發現所謂「社區經濟發展」的成果與受益可能僅限於社區特定幾位少數者，而且長期來說呈現出「殺雞取卵」的趨勢，反過來壓抑長期的社會資本累積。溝皂居民對於公共事務的治理信心不足，而較熱心的參與者在自救會分裂後，也感到挫折與寒心，這樣的情形是因為原有社區結構鬆散與社區規範不彰的條件下，透過形式的協商或公部門的介入，都不足以徹底解決問題所造成的無力感，社區意識的模糊與社會資本的不足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也不是可以馬上解決的問題，但是解決環境汙染問題可以是一個開始，只要有意識地運用各種資源、外力或機會去一步一步建構強化社區對規範的共識與重視，並以此基礎發展鄉村社區的永續治理，筆者認為這將是此起皮革工廠汙染事件帶給吾人最大的啟示。



第二節 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是屬於質性訪談與觀察的社區個案研究，而且受限於現實條件，未能作對溝皂社區作更長時間的後續追蹤，期待後續研究者能發展出更嚴謹的研究架構，有系統地對台灣鄉村社區的界定、規範與治理等相關議題進行更多質性與量性的比較分析研究，並且能針對關鍵個案進行長時間的追蹤研究，以期能取得更豐碩的研究成果。

本研究中突顯鄉村社區在空間與產業方面所產生的問題與矛盾，雖主要來自於社區居民所設立的中小型工廠生產，也許隨著產業的轉型與淘汰會慢慢減少此類矛盾，但是台灣人必須從過去的經驗中記取教訓，近十幾年來出現國家充當開發單位的大規模工業園區計劃，例如：雲林的離島工業區、彰濱工業區、中部科學園區、後龍科學園區...等，其規模更大且以公權力作後盾，對鄉村社區產生巨大的影響，但卻很少思考如何發展與鄉村社區雙贏共存的可能作法。如果政府持續推動這些鄉村工業化的政策，卻始終不考慮對鄉村社區的衝擊與居民的處境，那吾人就必須適時提出對政府的提醒與投入對民眾的教育工作，合力改變這個令人不安的發展方向。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王明珂(1995)群眾口述歷史的資料蒐集與分析。質化研究與專業實踐系列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輔仁大學應用心理系。
- 仇德哉(1989) 北港鎮志。雲林：北港鎮公所。
- 矢內原忠雄著、林明德譯(2004)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林南(2007)社會資本理論與研究簡介。社會科學論叢 1(1):1-32。
- 施威全(1996)地方派系。台北：揚智。
- 施添福(1999)台灣的人口移動和雙元性服務部門。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涂爾幹著、王了一譯(1966)社會分工論。台北：商務。
- 桑敦(James. W. Zander)著、彭懷恩譯(1992)社會學 Q&A。台北：風雲論壇。
- 威廉·哈維蘭(William A. Haviland)著、王銘銘譯(1987)當代人類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陳其南(1987)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
- 陳國川(1982)農村工業區對鄉村地區人口就業及外流的影響。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報告 8。
- 葉肅科(2006) 新移民女性人權問題： 社會資本／融合觀點。應用倫理研究通訊 39:33-45。
- 亞倫·強森(Allen G. Johnson)著、成令方等人譯(2003)見樹又見林。台北：群學。
- 孫立平(2001)國家-農民的實踐型態—試論「過程-事件分析」方式。經濟管理文摘 19。
- 徐震(1992)社區與社區發展。台北：正中。
- (2007)徐震教授論社區工作，台北：松慧。
- 莊芳榮(1991)臺灣地區寺廟發展之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 莊淑姿(2001)台灣鄉村發展類型之研究。台北：台灣大學農業推廣研究所之未出版博士論文。
- 湯京平(2002) 環境保護與地方政治：北高兩市環保官員對於影響執法因素的認知調查。台灣政治學刊 6:138-183。
- 楊懋春(1970)台灣土地改革對鄉村社會制度影響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
- 賀雪峰、劉銳(2009)熟人社會的治理—以貴州湄潭縣聚合村調查為例。中國農業大學學報 26(2)。
- 葛伯納(Bernard Gallin)著 蘇兆堂譯(1979)小龍村：蛻變中的臺灣農村。台北：聯經。
- 費孝通(2006 [1947]) 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費孝通(1990 [1951]) 雲南三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 廖正宏(1985)人口遷徙。台北：三民。
- 廖正宏、黃俊傑(1992)戰後農民價值取向的改變。台北：聯經。
- 廖培珊(2004)情感依附與居住滿意對台灣民眾遷移意向之影響。人口學刊 28:49-79。
- 謝宏昌(2003)全球化涵構中的鄉村性。全球衝擊與鄉村調適研討會。未出版。
- 謝高橋(1982)社會學。台北：巨流。
- 蔡文輝(1983)社會變遷。台北：三民。
- 蔡文輝(1993)社會學。台北：三民。
- 蔡必焜、王俊豪、卓正欽(2004)社會資本與永續社區發展。台灣鄉村研究 3:53-76。
- 蔡明惠(1998)台灣鄉鎮派系與政治變遷。台北：紅葉。
- 蔡墩銘(2010)社區與法律。台北：翰蘆。
- 蔡宏進(1991)社區原理。台北：三民。
- (1993)鄉村發展的理論與實際。台北：東大。
- (1997)近代工業化與都市化對農地利用與問題的影響。見蔡宏進著，台灣農業

與農村生活的變遷，頁 45-90。台北：農訓協會。

顏昭武(2002)從笨港到北港。雲林：雲林縣政府。

外文部分

Abel, R. (1995) Contested Communities. *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 22:113–148.

Alinsky, S. D. (1971) *Rule for Radicals: A Princip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Allen, V. L. (1975). Social Support for Non-conformit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8:1-43.

Altman, I., and S. Low, eds. (1992) *Place Attachment*. New York: Plenum Press.

Ayres, J. S., and H. R. Potter (1989) Attitudes toward Community Change: A
Comparison between Rural Leaders and Residents. *Journal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Society* 20(1):1-18.

Barbalet, J. M. (2000) Vagaries of Social Capital: Citizenship, Trust and Loyalty. in
Citizenship, Community and Democracy, edited by E. Vasta.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Bauman, Z. (2001) *Community: Seeking Safety in a Insecur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Beckley, T. M. (2003)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Sociocultural and Ecological
Factors in Attachment to Place. 105-125 in *Understanding Community-Forest
Relations*, edited by L. E. Kurger. Portland: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est
Service, Pacific Northwest Research Station.

Beggs, J. J., J. S. Hurlbert, and V. A. Haines (1996)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a Rural
Setting: A Refinement and Empirical Test of the Systemic Model. *Rural Sociology*
61(3):407-426.

Bender, T. (1978) *Community and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Brandenburg, A. M., and M. S. Carroll (1995) Your Place or Mine? The Effect of Place Creation on Environmental Values and Landscape Meanings.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8:381-398.
- Brehm, J. (2003) Social Capital and Poor Communities. *Contemporary Sociolology* 132(3):345-346.
- Brehm, J., and W. M. Rahn (1997) Individual 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999-1023.
- Bridger, J.C. (1996) Community Imagery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7(3):353-374.
- Bridger, J. C., and A. E. Luloff (1999) Toward an Interactional Approach to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5:377-387.
- Brown, R. B. (1993) Rural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nd Attachment in Mass Consumer Society. *Rural Sociology* 58(3):387-403.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ited by J.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Bullen, P., and J. Onyx (1999) Social Capital: Family Support Services and Neighborhood and Community Centres in NSW. Sydney: Family Support Services Association.
- Bursik, R. J. (1999) The Informal Control of Crime through Neighborhood Networks. *Sociological Focus* 32:85-97.
- Cantillon, D., W. S. Davidson, and J. H. Schweitzer (2003) Measuring Community Social Organization: Sense of Community as a Mediator in Social Disorganization Theory.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31:321-339.

- Christenson, J.A. (1979) Urbanism and Community Sentiment: Extending Wirth's Model.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0:387-400.
- Coleman, J. S. (1957) *Community Conflict*. Glencoe: The Free Press.
-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95–120.
- Connerly, C. E., and R. W. Marans (1985) Comparing Two Global Measures of Perceived Neighborhood Qualit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7:29-47.
- Coser, L. (1956) *The Functions of Social Conflict*.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Dayton-Johnson, J. (2003) Knitted Warmth: The Simple Analytics of Social Cohesion.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32:623–645
- Escobar, A. (1995)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ainstein, S. S. (2001) Competitiveness, Cohesion, and Governance: Their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Just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4):884–888.
- Feldman, R.M. (1990) Settlement-Identity: Psychological Bonds with Home Places in a Mobile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2(2):183-229.
- Field, J. (2003). *Social Capital*. New York: Routledge.
-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2000) Social Capital. 98–111 in *Culture Matters: How Human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 edited by L. E. Harrison and P. Samuel. New York: Basic Books.
- Goudy, W. J. (1990)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a Rural Region. *Rural Sociology* 55(2) :178-98.
- Giddens, A. (1985) *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 Cambridge : Polity.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481-510.
- Grootaert, C., and T. van Bastelaer (2002)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A Multidisciplinary Tool for Practitioner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 Hagan, J., H. Merkens, and K. Boehnke (1995) Delinquency and Disdain: Social Capital and the Control of Right-wing Extremism among East and West Berlin Yout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028-1052.
- Hawe, P., and A. Shiell (2000)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Promotion: A Review.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1:871–885.
- Hirschman, A. O. (1970) *Exit, Voice and Loyal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Janowitz, M. (1967) *W. I. Thomas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erson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ensen, J. (1998) *Mapping Social Cohesion: the State of Canadian Research*. Canadian Policy Research Network Study No. F-03. Ottawa: Renouf Publishing.
- Johnson, R. A. (2003) *Whistle-Blowing: When It Works – and Why*.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 Kasarda, J., and M. Janowitz (1974)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9: 328–339.
- Kaufman, H. A. (1959) Toward An Interactional Conception of Community. *Social Forces* 38(1): 8-17.
- Kawachi, I.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Health: Why Social Resources Matter.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ner City Health, Toronto.
- Keenan, S. P., and R. S. Krannich (1997) The Social Context of Perceived Drought Vulnerability. *Rural Sociology* 62(1): 69-88.
- Kemmis, D. (1990)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Norman: University of

- Oklahoma Press.
- Kornhauser, R. (1978) *Social Sources of Delinquenc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 Krishna, A., and N. Uphoff (1999) *Mapping and Measuring Social Capital: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 for Conserving and Developing Watersheds in Rajasthan , India*. Social Capital Initiative Working Paper #13.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 Lee, B. A., R. S. Oropesa, and J. W. Kanan (1994) Neighborhood Context and Residential Mobility. *Demography* 31(2):249-270.
- Levi, M. (1996) Social and Unsocial Capital: A Review Essay of Robert Putnam's Making Democracy Work. *Politics and Society* 24:45-55.
- Liao, Cheng-hung, and Nartin M.C. Yang (1979) *Socio-Economic Change in Rural Taiwan, 1950-1978*. Taipei: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Extension, NTU.
- Liu, Q. A., V. Ryan, H. Aurbach, and T. Besser (1998) The Influence of Local Church Participation on Rural Community Attachment. *Rural Sociology* 63(3):432-450.
- Luloff, A. E. (1998) *What Makes a Place a Community?* Bendigo: Latrobe University Press.
- Mayer, M., and K. N. Rankin (2002)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A North/South Perspective. *Antipode* 5:804-808.
- McMillan, D. W., and D. M. Chavis (1986)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4(1): 6-23.
- Meijering, L., B. van Hoven, and P. Huigen (2007) Constructing Ruralities: The Case of Hobbitste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3:357-366.
- Navarro, V. (2002) A Critique of Social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2:424-432.
- O'Brien, J. D., and E. W. Hassinger (1992) Community Attachment among Leaders in

- Five Rural Community. *Rural Sociology* 57(4):521-534.
- Ostrom, E.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 Co-production, Synergy, and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24:1073–1087.
- Park, R.E., and E. W. Burgess (1921)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erkins, D. D., P. Florin, R. C. Rich, A. Wandersman, and D. Chavis (1990) Participation and the Social and Physical Environment of Residential Blocks: Crime and Community Context.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8:83-115.
- Pooley, J. A., L. Cohen, and L. T. Pike (2005) Can Sense of Community Inform Social Capital?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2:71-79.
- Poland, B., D. Coburn, A. Robertson, and J. Eakin (1998) Wealth, Equity and Health Care: A Critique of a “Population Health” Perspective on the Determinants of Health.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46(7):785–798.
- Pretty, G. H., and M. McCathy (1991) Exploring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Women and Men of the Corpora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351-361.
- Putnam, R. D.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Y.: Simon and Schuster, Ins.
- Reidpath, D. D. (2003) Love thy Neighbour—It’s Good for Your Health: A Study of Racial Homogeneity, Mortality, and Social Cohe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57:253–261.

- Robinson, G. (1990) *Conflict and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 London: Belhaven.
- Rose, N. (2000) Citizenship and The Third Wa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 1395–1411.
- Roseland, M. (2000)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tegrating Environment, Economic, and Social Objectives. *Progress in Planning* 54:73-132.
- Sampson, R. J. (1996) The Community. 193-216 in *Crime*, edited by J.Q. Wilson Petersili. San Francisco: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Studies.
- Sampson, R. J., S. W. Raudenbush, and F. Earls (1997) Neighborhoods and Violent Crime: 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 *Science* 277:918–924.
- Serageldin, I., and C. Grootaert (2000) Defining social capital: An integrative view. In *Social capital: a multifacet perspective*. edited by P. Dasgupta and I. Serageldin. Washington, D. C.: The World Bank.
- Sharp, J. S., K. Agnitsch, V. Ryan, and J. Flora (2002) Social Infrastructure and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ies: The Case of Self-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Recruitment in Rural Iow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8:405-417.
- Stinner, F. William, M. Van Loon, S. Chung, and Y. Byun (1990) Community Size, Individual Social Position,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Rural Sociology* 55(4) 494-521.
- Sumner, W. G. (1906) *Folkways: A Study of The Sociological Importance of Usages, Manners, Customs, Mores, and Morals*. Boston: Ginn and Company.
- Toney, M.B. (1976) Length of Residence, Social Ties,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Demography* 13(3):297-309.
- Vincentnathan, L., and S. G. Vincentnathan (2008) Social Disorganization in a Modernizing Dalit Community.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5:565–579.
- Wakefield, S. E. L., and B. Poland (2005) Family, Friend or Fo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Relevance and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Health Promotion and Community

- Development.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60:2819–2832.
- Wellman, B. (1979) 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5): 1201–1231.
- Wilkinson, K. (1991) *The Community in Rural America*.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 Wilkinson, R. G. (1994) The 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 From Material Scarcity to Social Disadvantage? *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23(4):61–78.
- (1996). *Unhealthy Societies: The Afflictions of Inequality*. London: Routledge.
- William, D. R., M. E. Patterson, J. W. Roggenbuck, and A. E. Watson (1992) Beyond the Commun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 *Leisure Sciences* 14:29-46.
- Wilson, T.C. (1985) Settlement Type and Interpersonal Estrangement: A Test of the Theories of Wirth and Gans. *Social Forces* 64:139-50.
- Woolcock, M. (1998) Social Capit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and Policy Framework. *Theory and Society* 27:151–208.
- Wulfhorst, J.D., A. E. Luloff, S. Albrecht, and S. Lopez (2001) Perceptio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ural Indian Identity. *Journal of Rural Community Psychology* E4: 1-21.
- Zaff, J., and S. Devlin (1998) Sense of Community in Housing for the Elderly.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6:381-398.

附錄一 訪問大綱

第一部分 對社區現況的看法

- 1-1 該怎麼界定「溝皂」的範圍與成員？
- 1-2 「溝皂」的凝聚力如何？可以舉例說明嗎？
- 1-3 身為「溝皂」的一份子，您的感覺如何？
- 1-4 溝皂居民之間的關係與相處模式大致為何？
- 1-5 您如何看待溝皂的人口外流與老化？

第二部分 對社區規範的看法

- 2-1 「溝皂」的成員是否有應盡的責任或義務？
- 2-2 溝皂是否有特殊的風俗民情或傳統習慣？
- 2-3 共同的風俗習慣是否日趨淡薄？您認為是甚麼原因造成的呢？
- 2-4 溝皂的公共議題都是如何討論與決定的？
- 2-5 居民都是怎麼互相影響的？怎麼約束彼此行為以符合規範？
- 2-6 人際間流傳的小道消息或耳語會對人們的行為會有影響力嗎？
- 2-7 目前社區內爭議的公共問題是哪些？您認為情勢會如何演變？

第三部分 鄉村工業化與對社區之影響

- 3-1 溝皂有哪些非農產業？您對這些產業瞭解程度深嗎？
- 3-2 這些非農產業的資金、技術、設備、人力與土地...等都是怎麼來的呀？
- 3-3 這些非農產業對溝皂的社區文化與日常生活產生何種影響？
- 3-4 這些非農產業為溝皂的環境與社會關係帶來怎麼樣的利與弊？
- 3-5 日前社區內爭議的皮革工廠污染事件，您瞭解程度為何？
- 3-6 社區在處理皮革工廠污染事件時，所遇到的具體困難為何？

第四部分 居民基本資料

年齡、性別、學歷、宗教、婚姻狀況、家中成員數、主要收入來源、居住與活動範圍、是否曾長期出外、是否曾擔任公共性職務...

附錄二 訪談對象列表

編號	人物速描	分類
A1	男性，57 年次，從事鐵工與農牧。現任鎮農會代表與自救會會長，擔任過國小家長會長與真武殿委員，曾參與牛車公園建設與武館，現居 11 鄰。	I
A2	男性，59 年次，經營工程行，擔任過國小家長會長，曾參與自救會與牛車公園建設，現居 11 鄰。	I
A3	男性，51 年次，從商，現任里長與國小家長會長，曾參與基地台抗議與牛車公園建設，現居 10 鄰。	III
A4	男性，41 年次，務農，現任溝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宋江陣教練，曾參與過武館，現居 10 鄰。	III
B1	男性，18 年次，曾擔任武館館主，現居 8 鄰。	III
B2	男性，16 年次，擔任宋江陣教練，曾參與武館，現居 11 鄰。	III
B3	男性，22 年次，領老農年金，現居 8 鄰。	IV
B4	男性，32 年次，1965-1987 擔任東榮國小教師，現居北港鎮。	
B5	男性，25 年次，1960 從水林入贅，務農，擔任過水利會小組長，曾參與武館，現居 9 鄰。	III
C1	男性，50 年次，天嵩皮革業者，1983 由新港搬來，11 鄰。	II
C2	男性，45 年次，億昌皮革業者。現居 12 鄰。	III
C3	男性，46 年次，鴻和皮革業者，曾參與武館，現居 12 鄰。	II
D1	女性，58 年次，從事保險業，由宜蘭嫁過來，現居 10 鄰。	I
D2	男性，42 年次，務農，曾參與自救會，現居 11 鄰。	I
D3	男性，47 年次，務農。現任 2 鄰鄰長。	III
D4	女性，52 年次。大陸配偶，住家鄰近皮革工廠，於工廠內工作，現居 11 鄰。	III
D5	男性，50 年次。曾參與自救會，現居 2 鄰。	I
D6	女性，50 年次，經營早餐店，由隔壁庄番溝嫁過來，現居 3 鄰。	III
D7	男性，70 年次，曾在鴻和皮革工廠工作過，曾參與自救會，現居 11 鄰。	I
D8	男性，65 年次，務農，曾參與自救會，現居 3 鄰。	I
D9	女性，52 年次，務農。現居 7 鄰。	III
D10	男性，62 年次，務農。現居 4 鄰。	IV
D11	女性，58 年次，蘭花園女工。現居 6 鄰。	III
D12	女性，56 年次，附近肉鬆工廠女工，現居 6 鄰。	III
D13	男性，53 年次，建築工，現居 11 鄰。	I

附錄三 溝皂歷史年表

時間	台灣	北港、元長	溝皂
1895-99	1895 日治開始 1898 實施保甲制度	1898 設國語傳習所	
1900-10	1908 西部縱貫鐵路全線通車	1908 重修朝天宮 1910 北港糖廠開始	
1911-20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6 縱貫公路粗具雛形 1920 開始推動地方自治	1914 北港信用合作社 1917 嘉義線鐵路客運	
1921-44	1937 皇民化運動開始	1921 朝天宮管理規則與管委員會成立 1926 文協設北港支部 1929 北港郵便局設立 1930 北港街水道(北港自來水廠前身) 1934 北港大橋 1941 北港專修農業學校(今北港農工) 1944 嘉義客運北港辦事處	1922 好收國校設立
1945-59	1945 二戰結束，社會動盪 1947 二二八事件 1948-53 三階段土地改革 1949 國民黨撤退來台 1949 實施戒嚴 1950 臺灣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1950 韓戰爆發 1951 美援開始	1946 北港糖廠由台糖重新經營 1950 重設雲林縣，北港區改稱北港鎮 1951 第一屆鎮長選舉 1959 八七水災(艾倫颱風)	1950 好收國民學校溝皂分班 1952 好收國民學校溝皂分校 1956 東榮國民學校 1958 東榮國小 1958 溝皂開始有電
1960-69	1960 獎勵投資條例(使工業用地取得法律依據) 1962 台視開播 1963 六堵示範工業區 1965 美援終止 1966 工業產值超過農業 1966 高雄加工出口區 1968 推動九年國教	北港出現大裕、振豐和鑫福等成衣工廠 1962 萬有紙廠設立 1962 陸續建產業道路 1969 沙拉油的出現，衝擊北港農產集散地位	1960 年代開始，在五穀與甘蔗等大宗作物外，1/4 左右的面積開始種植各項經濟作物，如洋菇、木耳。 1960 年代，薄荷油工廠與碾米廠(蔡寶林父子) 1960 年代以前，與北港街區交通方式多為牛車或馬達三輪車共乘 1967 年溝皂開始有第一台電視
1970-79	1971 台灣退出聯合國 1972 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 1972 省政府推動「客廳即工廠」，鼓勵家庭從事副業 1973 第一次石油危機 1973 宣布十大建設 1978 台美斷交 1978 中山高通車 1979 鐵路電氣化	1974 元長工業區開發完成	1970 年代開始出現家庭式皮革工廠(黃番薯)，未立案工廠陸續設立：昌陽(蔡清水/蔡炳灯 1978 登記)、林旺(蔡寶林 2002 登記)、益榮(余東守 2002 登記) 1977 老婦假車禍事件 1978 動工建廟(真武殿) 1978 中美斷交，洋菇、木耳等外銷受到影響後，種植面積減少
1980-89	1980 外銷導向產業開始外移 1980 新竹科學園區 1985 十信案爆發 1988 解除報禁 1988 五二〇事件 1989 台灣解嚴	1981 台汽客運北港站 1981 台糖小火車停止客運 1985 媽祖醫院開業	1983 空照，稻米轉作 黃番薯經營不善，新港人接手天嵩(林枝進 1983 登記)、煌典皮革工廠設立(蔡煌山 1984) 1986 皮革工廠堆高機重大車禍 1982 公池由租變佔
1990-99	1990 股市至 12,682 高點 1996 房地產年買賣移轉件數達 50.87 萬案高點後逐年下降 1997 口蹄疫爆發	1998 萬有紙廠開始出現經營掏空 1997 華僑銀行北港分行(首家民營金融機構)	1990 年代，因收購價格不佳，甘蔗面積驟減，有農民開始種植蘭花與梨 1990 昌陽皮革工廠倒閉 1998 鴻和(蔡清和/蔡逸勳)
2000-09	2000 台灣政黨輪替 2001 GDP 出現 1947 年以來首次負成長	2000 開始有天然瓦斯 2007 萬有紙廠破產，員工與銀行團血本無歸 2009.04 媽祖遶境開始擴大到北港街區外鄉村 2009.12 縣市長選舉	2001 收回公池爭議 2001 里辦公室虧空案 鴻仁(蔡清和/蔡逸勳 2001) 2005 教育局協調校地爭議 2007 鴻和原廠被法拍，大勝接手經營(許清潭/許譽子) 2007.03 社區 10 鄰基地台抗議事件 2007.09 居民與皮革業者協調 2009.06 協調會改善承諾確定跳票 2009.07 社區環保自救會成立 2009.08 媒體報導、莫拉克颱風、縣長訪視、縣府勒令停工 2009.09 社區數處田地測出超標管制 2009.11 里民大會
2010-			2010 收回一公池，建設牛車公園 2010.04 業者與少數居民非正式協調